

圖像、調查與翻譯： 製作長白山「瑞樹」^{*}

賴毓芝^{**}

摘 要

長白山被視為清朝先祖誕生之地，因此不僅被視為清帝國的聖山，山中生長的樹木更常被與清之國運相提並論。乾隆皇帝於乾隆十七年（1752）所作的〈瑞樹歌〉，即是歌詠生長於長白山深處的異樹。此樹不僅巨大，且單單一棵樹上即生長了多達八樣樹種各異的樹葉與毬果，樹幹上甚至有靈芝九本環附而生，因而被乾隆皇帝視為象徵「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之瑞樹。本文即以清宮所藏三件與此瑞樹有關的圖繪為中心，包括臺北故宮所藏王幼學畫《瑞樹圖軸》、北京故宮所藏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與余省畫《瑞樹圖冊》，結合滿、漢文檔案，探討乾隆皇帝為何對此八種樹充滿興趣，又如何派遣團隊去實地調查此傳說中的異樹。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的團隊如何斟酌八種樹種名稱的滿漢翻譯？宮廷畫家如何有意識地使用不同風格與構圖格套？最後，本文將試圖論證乾隆皇帝如何透過外來的擬真風格與自然調查的手段，在現實層面上將滿人的根源建構成與統治正統性有關的瑞兆。

關鍵詞：瑞樹、長白山、滿文翻譯、新清語、清宮繪畫

*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5月31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長白山被視為清朝先祖誕生之地，¹康熙皇帝對此發祥地非常重視，康熙十六年（1677）即派遣侍衛吳木訥組團前往長白山進行調查，²以使長白山作為滿族根基及天命眷顧的定位更具體地呈現。³調查結束後，康熙皇帝除了以「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之外，⁴還於康熙十七年（1678）「敕封長白山之神，祀典如五嶽」。⁵康熙皇帝不僅派遣專人親自登山調查，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東巡時更在松花江畔親自望祭長白山。⁶為了《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派遣駐防協領勒轍前往

¹ 關於滿洲的開國與長白山的關係，見 Pamela Kyle Cross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 *Late Imperial China*, 6:2 (December 1985), pp. 13-24.

² 乾隆九年的《大清一統志》將調查的主要負責人稱為「吳木訥」；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內大臣覺羅武」，四庫版所收錄的乾隆二十九年《大清一統志》則稱「武穆訥」。歐立德（Mark C. Elliott）認為皆應為滿文“Umuna”的音譯，也有學者拼成“Umune”，義大利學者 Giovanni Stary 則認為滿文原名應該是“Umne”，目前多數學者採用歐立德的拼法。見〔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乾隆九年本），卷 31，葉 15 上；〔清〕和坤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474，卷 45，葉 4 下-5 上；〔清〕王士禎，《池北偶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870，卷 4，葉 20 下；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August 2000), pp. 603-646; Giovanni Stary, "Il 'Vero' Esploratore Del Changbaishan e Il Valore Delle Relative Fonti: Un'analisi Critic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78:3/4 (2005), pp. 501-522; Ruth Rogaski, "Knowing a Sentient Mountain: Space, Science, and the Sacred in Ascents of Mount Paektu/Changb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2:2 (March 2018), pp. 724-725, footnote 17.

³ 有關此調查的相關研究，見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3, pp. 603-646; Giovanni Stary, "Il 'Vero' Esploratore Del Changbaishan e Il Valore Delle Relative Fonti: Un'analisi Critic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78:3/4, pp. 501-522; Stephen Whiteman, "Kangxi's Auspicious Empire: Rhetorics of Geographic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Qing," in Yongtao Du and Jeffrey Kyong-McClain, eds.,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chapter 2, pp. 33-54; Ruth Rogaski, "Knowing a Sentient Mountain: Space, Science, and the Sacred in Ascents of Mount Paektu/Changb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2:2, pp. 716-752.

⁴ 〔清〕馬齊、張廷玉等奉敕修纂（下略），《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冊 2，卷 69，葉 3 下。

⁵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冊 2，卷 71，葉 10 下。

⁶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冊 5，卷 101，葉 25 下。

長白山探勘並繪製輿圖，並爆發了朝鮮邊民非法越界採蔘誤傷調查團官役之三道溝事件。⁷1710 年代，更爲了進行以歐洲製圖法繪製《皇輿全覽圖》，兩度派穆克登前往長白山，勘查圖門江與鴨綠江源頭，並爲中朝定界等。⁸

清代帝王有意識地且幾乎是獨斷地將長白山與滿洲根源及其主體性連動，很早就受到重視清朝滿洲性的新清史學者的關注。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早在 2000 年即指出，長白山之所以成爲滿洲根源的象徵，乃是歷經康、雍、乾三帝一連串的宣稱、儀式、文本生產等過程所努力建構而來的。尤其東北這塊被認爲滿人龍興之地，原本是很多不同部族的生活空間，不但範圍很難定義，坐落於此的長白山事實上也非滿人所獨占。然而透過康熙朝時期吳木訥的實調、望祭、西法地圖的測繪，甚至到乾隆皇帝筆下充滿想像的〈盛京賦〉等，歷史上模糊的東北地帶因而被定義爲「滿洲」(Manchuria)。「滿洲」不再是一個種族的名稱，作爲一個「地方」(place)的「滿洲」也在十七世紀末誕生了，同時也爲二十世紀滿洲國的成立，立下了一個重組過去遺產的基礎框架。⁹雖然歐立德的文章處理的是康熙朝的材料，並一路將其議題延續到二十世紀，但是某部分來說，此議題可以說是延續 1987 年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對於《欽定滿洲源流考》之研究。柯嬌燕指出乾隆皇帝透過編撰〈御製盛京賦〉(1743)、《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1781)、《欽定滿洲源流考》(1783) 等文本，將滿族傳統的部落神話與儀式體制化，乃清廷對於以傳說爲主之滿洲根源與傳統最全面且系統化的官方建置，¹⁰確使滿洲傳統成爲帝國重要的基石。

⁷ 見劉曉東，〈康熙朝「三道溝事件」的處置與對馬倭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5 期，頁 57-65；Seonmin Kim, "Making the Borderland," in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47-65.

⁸ 見 Seonmin Kim, "Making the Borderland," in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 pp. 65-70.

⁹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pp. 603-646.

¹⁰ Pamela Kyle Crossley, "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4 (November, 1987), pp. 761-790.

長白山作為一個物產豐饒而多元、且緊鄰朝鮮的區域，促使康熙皇帝多次派人實地勘查，並派遣歐洲傳教士以西法進行地圖測繪；它在清帝國中的重要地位，不僅吸引關心滿洲認同與主體性建構議題的學者，近年來更吸引環境史、經濟史、地圖史、邊境史與知識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成果極具開創性。金宣旻（Seonmin Kim）討論《皇輿全覽圖》的測繪、人蔘盜採、及中朝邊境的界定間的複雜關係。¹¹謝健（Johathan Schlesinger）以物品的環境史角度討論東北如何被建構而成；相對於漠地而言，一個未被破壞、充滿活力、潔淨（bolgo）的地域，該地的原始物產如毛皮、東珠、蘑菇等，不僅與滿洲認同有關，更成為官員爭相效尤與消費的風尚。¹²羅芙芸（Ruth Rogaski）更是以知識史的角度討論長白山這樣一個難以到達、且充斥著未知的原始環境究竟是如何被「認識」；她大量運用康熙皇帝第二次東巡時，隨行的高士奇與南懷仁的紀錄，試圖論述「看到」這個感官經驗（the sense of sight）在創造長白山的知識中如何占有關鍵地位。¹³

羅芙芸的研究提醒我們，「看」的確在長白山的滿洲根源建構中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究竟「看」什麼？如何「看」？如何證明真的「看到」了呢？從十八世紀的歐洲科學史發展來看，實證科學即與圖像的使用密不可分，「看到」看似為「實證」的基礎，然而，「看」從來不是一個純然中性的行為。Lorraine Daston 與 Peter Galison 對於科學所強調的「客觀性」（objectivity）研究也指出，「看」不但不是客觀的，所謂的「客觀性」，更是一種因應某種特定時空與需要下的選擇，是一種具有政治性判斷的修辭。¹⁴康熙皇帝如此強

¹¹ Seonmin Kim, "Making the Borderland," in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 ŏn Korea, 1636-1912*.

¹² Joh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¹³ 見 Ruth Rogaski, "Knowing a Sentient Mountain: Space, Science and the Sacred in Ascents of Mount Paektu/Changb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2:2, pp. 716-752. 此文後來擴充為專書，見 Ruth Rogaski, *Knowing Manchuria: Environments, the Senses, and Natural Knowledge on an Asian Borderl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esp. chapter 2 & 3.

¹⁴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Cambridge: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2007).

調實地調查與目驗，並使用西方地圖繪製加以呈現，似乎與歐洲科學革命以來對於新世界的探勘如出一轍，這是否是一個全球史的面向？實證性的「客觀」，究竟是在什麼樣選擇下的「客觀」？而康熙皇帝與乾隆皇帝的選擇是否有所不同呢？

前述諸多在新清史啟發下發展出的長白山研究，雖然一再以康熙皇帝所啟動的踏查為研究標的，卻很少分析其可能的全球面向。更讓人驚訝的是，在材料的使用上，這些研究多僅依賴文字文本的記載，然而事實上，康熙皇帝多次帶領南方群臣出巡塞外，直接教導他們認識北方的動植物生態，而且其近臣蔣廷錫為宮中所作的大型圖譜《鳥譜》，更包含許多滿洲特有物種的描繪，如今兩岸故宮都藏有各種塞外特有種的植物圖繪。¹⁵謝健的研究已經指出，這些新物種在中文世界的引介，的確帶來許多無法翻譯與物種的確認問題。¹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關於物種的知識與搜尋早已是一項全球性產業，而圖像在知識交流與物種名稱的翻譯上，都扮演無法取代的角色，¹⁷而活躍於清宮、協助帝國測繪的歐洲傳教士，也正是這一全球知識產業的重要參與者。從這個角度看，對長白山的研究若僅倚賴文字，而沒有納入圖像生產的考查，將無法全面理解雙語清帝國在建構其滿洲根源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包括滿漢翻譯、物種命名、滿洲自然知識與中文古典傳的嫁接等問題。

¹⁵ 賴毓芝，〈康熙朝宮廷「畫院」的運作與盛清院體的奠立：以蔣廷錫團隊為中心〉，《藝術學研究》，期 31（2022 年 12 月），頁 1-106。

¹⁶ Joh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pp. 34-35.

¹⁷ 關於植物的全球網絡與帝國建構的關係，在西方科學史已經有非常多討論，然多是從西方的角度來切入，參見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nda Schiebinger and Claudia Swan, eds.,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Daniela Bleichmar, *Visible Empire: Botanical Expeditions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Yota Bataki, Sarah Burke Cahalan, and Anatole Tchikine, *The Botany of Empi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相對於以往多聚焦於康熙朝的研究，本文則將視野延伸至乾隆朝，討論乾隆皇帝對一棵生長於長白山深處之瑞樹的調查過程，包含物種的辨識、標本的採集、滿漢文的翻譯、畫家的派遣與圖繪等環節，材料亦擴及圖像與標本等不同媒材。本文以個案分析方式，探討乾隆皇帝與其團隊如何運用歐洲殖民帝國常見的統治與調查技術，操控漢文世界對於滿洲發源地的認識，尤其關注「圖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長白山不僅是清帝國的聖山，山中所生長的樹木，更常被視為清朝國運象徵，兩者時常相提並論。乾隆皇帝就曾經歌詠過兩棵與清朝國運密切相關的異樹，其一見於乾隆十七年（1752）的〈瑞樹歌〉，¹⁸另一見於乾隆十九年（1754）的永陵〈神樹賦〉。¹⁹前者為生長在長白山深處、鴨綠江支流畢叡河上游的大樹。這棵樹不僅巨大，且單單一棵樹上即生長了多達八樣樹種各異的樹葉與毬果，樹幹上甚至有靈芝九本環附而生，因而被乾隆皇帝視為象徵「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的瑞樹。後者則為生長在永陵興祖寶鼎上的著名老榆樹。這棵樹之所以得名，與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東巡時謁永陵所作的〈神樹賦〉密切相關。它不僅被視為大清啓運的象徵命脈，其於同治年間的倒塌，更一度引發朝廷的慌亂。神樹雖經永陵總管搶救與奉天將軍等官員的呵護而殘存下來，最終仍難逃文革浩劫，僅存殘段，留存在永陵西配殿中，供人憑弔。²⁰值得注意的是，雖有乾隆御製賦文及諸詞臣唱和，但他並未下令為永陵神樹製作圖像。相對而言，長白山瑞樹自始即透過圖像製作被納入政治建構過程。現今尚存至少一件大軸、兩件冊頁與一件扇面圖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分析圖像與統治關係的珍貴個案。

¹⁸ 〔清〕清高宗，〈瑞樹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 31，葉 2 下-3 下。

¹⁹ 〔清〕清高宗，〈神樹賦〉，《御製文初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卷 24，葉 15 下-18 上。

²⁰ 關於永陵神樹的始末，見馮明珠，〈永陵神樹：一棵攸關大清國運的榆樹〉，《故宮文物月刊》，期 316（2009 年 7 月），頁 84-95；馮明珠，〈永陵河工〉，《故宮文物月刊》，期 348（2012 年 3 月），頁 52-61。

二、長白山的瑞樹圖像

目前所存與長白山瑞樹相關的圖繪共有四件，分別為臺北故宮所藏王幼學畫《瑞樹圖軸》（附圖 1），北京故宮所藏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附圖 2）、余省畫《瑞樹圖冊》（附圖 3），以及方琮畫山水、錢陳群書《瑞樹歌成扇》。由於北京故宮所藏《瑞樹歌成扇》未見圖版發表，因此尚無從得知其實際圖像為何。

第一件王幼學畫《瑞樹圖軸》，為高達 339.1 公分，寬至 197.8 公分的絹本大立軸。畫家以近景描繪一棵生長在水邊、樹根錯節、枝樞茂密的大樹。此樹位於正中央，幾乎占滿整個畫面，樹冠以主幹為中心，呈近乎對稱的三角形；正中央的樹枝，不是使用前縮法，就是透過描繪分支向下旋轉的方式，呈現枝樞往觀者方向的延伸。整體不僅在二度空間的構圖上相當穩定，也盡力表現出三度空間中各個枝樞的空間關係。在畫法上，樹身、枝樞與右下的石頭，以展現筆跡運行、提頓、轉折的皴法畫出；樹葉部分則是用顏料沒骨層層暈染出質感與向背，尤其樹冠中間部分還有幾叢敷以石青、石綠的小樹葉，整體顯得尊貴挺拔而富麗堂皇。作品的右上角有汪由敦奉敕所書的〈御製瑞樹歌〉，左下角則有「乾隆庚午三月。臣王幼學奉敕 恭繪」的簽款，並鈐有「幼學」、「恭畫」兩枚印章。因此可以知道此件作品乃王幼學奉敕作於乾隆十五年（1750），即庚午年。

另兩件冊頁作品並沒有紀年，多年前在北京故宮的藏品典藏系統中檢索，兩者分別標為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與余省畫《瑞樹圖冊》，然尺寸、裝裱與格式上，卻幾乎完全一致。兩件作品皆由兩本冊頁組成：第一本冊頁是一幅摺起來可攤開的《瑞樹圖》，第二本冊頁則以滿、漢兩體之奏摺作為第一開，其後標為余省、王幼學所畫者為圖繪的八種樹葉，至於標為余省所畫者，則為嵌黏的八種樹葉實體標本，兩者在格式與大小上幾乎完全雷同。雖說僅有

王幼學畫《瑞樹圖軸》有「庚午三月」紀年的訊息外，但三件畫作都書有乾隆御製〈瑞樹歌〉（見附錄一）。

由圖冊內容可知，長白山匯聚所有水源，萬木生長於其中，乃是神仙所居的天都之地。而山中有一為眾樹群星拱月之瑞樹，乾隆久聞其名，有心識之，因此命人前去作畫，以見其神奇。唯瑞樹所在之地乃鴨綠江支流的畢歆河畔，一般船隻無法到達，一行人開始時溯溪而上，其後則必須改走陸路前進，行約一由旬的距離，²¹才看到巨大的瑞樹，「聳身三丈五尺餘，七分去二其合圍」，且樹身上有十二分枝。瑞樹不僅四周無凡草，且「莖葉輪囷各異姿」，「其種有八若列眉」，這十二分支中，包含有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等八種樹木的枝葉或果實，樹身上還長出了一年開花三次而被稱為「三秀草」的靈芝九本。²²乾隆皇帝特別強調上述所言「是皆紀實非虛詞」（附錄一），而且相信這是上天之祕藏，不會讓塵世之人輕易窺看。乾隆皇帝並自豪地宣稱，此瑞樹比起古代寓言中以八千年為春的「大椿」，²³簡直就像是父與子的關係。因此，長白山瑞樹可說是凌駕之前古史記載中的神樹。全詩最後以「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作結，歌詠長白山乃是大清開國萬世之基。

三、「是皆紀實非虛詞」：長白山的實地調查

乾隆御製詩中具體地描述出所有關於此樹數字上的資訊，包括「聳身三丈五尺餘，七分去二其合圍，上分十有二大枝」，並特別強調上述所言「是皆紀

²¹ 「由旬」為梵語 *yojana* 的音譯，是距離單位。在《大唐西域記》中，指的是帝王一日行軍之程。實際距離按《大漢和辭典》中的解釋，因為地形險峻不同有諸說，又分大、中、小由旬，約從十六里到八十里不等。見〔唐〕釋辯機撰，釋玄奘譯，《大唐西域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593，卷 2，葉 2 上；另參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冊 7，頁 1067。

²² 乾隆御製詩言：「靈芝九本三秀滋」，「靈芝」又名三秀草，始出《楚辭·九歌·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後《爾雅翼》釋之：「芝，瑞草，一歲三華，故《楚辭》謂之三秀。」見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冊 1，頁 140。關於乾隆御製詩，見附錄一。

²³ 《莊子·逍遙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見王叔岷，《莊子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冊上，頁 13。

實非虛詞」。乾隆皇帝如何得以特別強調所言「是皆紀實非虛詞」，並以「大椿徒傳八千歲」一句，挑釁地認為《莊子·逍遙遊》所載「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之漢傳統中可能是最古老的樹「大椿」不過是「徒傳」之說？檢視兩本冊頁本的《瑞樹圖冊》，會發現其中都包含一開以滿、漢兩體抄錄二等侍衛巴思哈所上呈之奏摺（附錄二）。將此奏摺與乾隆御製詩相對照，即可知乾隆詩中關於瑞樹之位置、路程、具體丈量尺寸等資訊，應該是根據巴思哈奏摺中的訊息。這份奏摺中充滿了實地調查的細節，若同時參照更具敘述性的滿文奏摺，可以更進一步地具體掌握御製詩中所指涉內容的來龍去脈。

根據此一奏摺，我們知道乾清門的二等侍衛巴思哈奉命前去探勘生長在畢歆河畔的瑞樹，並帶領畫院待詔王幼學經過寧古塔到達三姓地區。誰是巴思哈？乾清門二等侍衛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官職？清宮侍衛，從努爾哈赤創業之初的家丁或奴僕，漸漸演變成內廷近御之臣，²⁴因其身為「近侍御駕之人」，跟皇帝的關係尤其親密。因此在挑選侍衛時，以上三旗的滿洲、蒙古弟子為主，並有宗室侍衛的專額定編。許多滿蒙大員都曾任御前侍衛或乾清門侍衛，例如康熙時期的索額圖曾任三等侍衛，乾隆時期的傅恆曾任頭等侍衛，福康安曾任乾清門三等侍衛、後擢御前行走二等侍衛等。²⁵尤其在乾隆朝以後，乾清宮成為皇帝處理政事、舉辦宴筵，與接待朝臣及外藩屬國陪臣的主要場所；同時，乾清門不僅是康熙以來「御門聽政」之所在，也是許多儀式舉行的場所。因此，乾清門侍衛與御前侍衛不僅待遇最高，²⁶也是皇帝的親信，常常成為皇帝的耳目與特使。巴思哈除了擔任乾隆的特使，也曾負責皇子的教育，《清實錄》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癸酉（26日）上曾記載：「三阿哥現年十五歲，尚未能騎射，皆俺達等平時並未悉心指授所致。御前侍衛護軍統領烏爾登、乾清門

²⁴ 皇帝的家僕出身者，在清宮被稱作包衣（滿文稱 booi, 即家人），是非常特別的族群，有其特別的晉升管道，見祁美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²⁵ 見常江、李理，《清宮侍衛》（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表1，頁265-266。

²⁶ 常江、李理，《清宮侍衛》，頁82-83。

二等侍衛巴思哈，各著罰俸一年。」²⁷若對照我們後面將討論的檔案，可以知道這正是巴思哈被派去長白山調查的前一年。

如此看來，巴思哈在被罰俸還沒期滿前，就被派去長白山調查瑞樹，而這樣的行動顯然需要當地的配合支援。負責統籌者為駐紮在當地的副督統富僧阿（Fusengga），他找了熟悉路徑的驍騎校向齊（Hiyangci）、披甲遮赫呼（Jehere）與閒散希呼犒（Hirkoo）為前導，並帶領領催 3 人、披甲 29 人隨行，所以整行人至少有 38 人。除了王幼學外，漢文奏摺提到整團人「由松花江，泛舟過烏蘇哩江，抵畢歆河河口」，滿文奏摺則更清楚地說明整團人坐著尖頭的獨木刀船（jaha）逆流而上。到了畢歆河河口，「樹木蒙密，水勢湍迅」，刀船已經不能行走，只能換上更小的獨木舟威呼（weihu），繼續「溯流而上」，抵達西呼墨勒溪口。到了西呼墨勒溪口，連威呼小舟都無法使用，遂上岸，步行三十餘里，終於看到長在溪岸旁的長白山瑞樹（附圖 4）。

關於這棵瑞樹的外形，漢文奏摺描述其整體樹形「如小葉楊樹，而質直理堅」，「自根至杪，約十丈餘……圍抱二丈五尺，挺幹三丈五尺。其上分十二大枝，枝上又出二十餘小枝，莖葉各異」，而御製詩則稱其「聳身三丈五尺餘，七分去二其合圍，上分十有二十大枝」。以樹圍來說，根據巴思哈奏摺，應該是二丈五尺，御製詩可能為了對仗工整等詩韻上的考慮，將其轉換為「七分去二其合圍」。「二丈五尺」為何是「七分去二」？因為聳身的「三丈五尺」之「七分去二」，即「三點五」乘以「七分之五」，剛好得出「二點五」，也就是奏摺中所說的二丈五尺。至於樹高，巴思哈奏摺提到從樹根到樹尖為「約十丈餘」。那麼，奏摺載「挺幹三丈五尺」與御製詩稱「聳身三丈五尺」，所指為何？是主幹的尺寸嗎？檢視滿文奏摺部分，可知此「三丈五尺餘」的「挺幹」，為滿文“sihin”的翻譯，也就是《五體清文鑑》翻譯作「樹頭」的樹冠部分。²⁸亦即，這棵樹從樹根到樹梢高達十丈餘，而光是樹冠部分就有三丈五尺餘，因此主幹應該有六丈五尺。這樣究竟有多高呢？從根到樹梢共十丈，也就是一百

²⁷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 341，葉 21 上。

²⁸ [清]清高宗敕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冊下，頁 4070。

尺，以清代量地尺一尺約 34.5 公分計，一百尺約等於 34.5 公尺。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所主編的《住宅建築模數協調標準》，一般住宅層高的適宜數值為 2 至 3 公尺，²⁹即使取較高層高標準的 3 公尺，此棵瑞樹也超過十一層樓，其主幹亦超過七層樓，這樣的高度，雖然稍矮於號稱臺灣第一神木、位於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的「大安溪神木」（其樹高約 55 公尺），³⁰也已經是一棵驚人的巨樹了。

這棵巨大瑞樹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樹冠部分共分爲十二巨支，這些巨支上又分出二十餘支的小分支。這些分支上長出果松、檜木、樺木、密特克木、遮勒穆期木、白榆、樺皮等不同樹種的樹枝，如果再加上作爲主幹的小葉楊樹，共有八種樹共生於一株（附圖 5）。其中果松、檜木的莖枝較爲粗壯，如碗大小，其他樹種則「如臂如指」、甚至如筷子般細小，且在樹形上，東、南兩方枝葉繁密，西、北兩方樹葉生長則較爲疏鬆。更重要的是，環繞樹身而生的還有九本靈芝。巴思哈稱其因此「詳閱累日，驚喜歎異」，並進而仔細檢視樹的形態，細密地描繪成圖，³¹同時摘取樹的枝幹、樹葉，連同此奏摺一起上呈皇帝御覽。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路上，巴思哈尚且著意於記錄行經的山川勝景，最後帶回繪圖五幅，包括寧古塔西南八十里的阿補淀、淀內以石作成的捕魚魚梁（fakū）、正西百里的德哩安平石、船廠（今吉林）東南二百里的拉法峰、以及吉林城東十里的祈雨潭等（附錄二）。除此之外，他還命人繪製了吉林地區的地圖一幅，與所捕獲的異雀八種的圖繪。³²這些樹形圖、地景圖、地圖與異

²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編，《住宅建築模數協調標準》（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頁 2-3。

³⁰ 關於大安溪神木的樹高，請參考林務局官方網站：https://media.forest.gov.tw/photo_page.php?mID=TFB-ph-103_00_08291（2021 年 5 月 17 日檢索）。

³¹ 漢文奏摺僅說：「謹按樹形，詳繪爲圖」，滿文奏摺則強調仔細檢視樹的形態，細密地描繪成圖（...moo i arbun be tuwame, narhūsame nirugan nirufi...），見附錄二。

³² 乾隆十五年正開啓一項編纂大形鳥類圖錄《鳥譜》的計畫，因此，上述雀鳥的採集是否與《鳥譜》的計畫有關呢？很值得另外撰文討論。關於乾隆的《鳥譜》編纂計畫，見柳澤明，〈故宮博物院藏滿漢合璧《鳥譜》〉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期 3（2004 年 7 月），頁 18-39；李滉，〈藝術的科學，科學的藝術：清代宮廷畫譜〉，《紫禁城》，2004 第 2 期，頁 87-103；

雀圖，應該都是隨行畫家王幼學所為。然而，最後上呈的還包括命余省設色繪製的各種樹葉，應該是上述兩冊《瑞樹圖冊》中的一冊。但由於余省並沒有參與此長途旅行，因此應該是調查隊回到宮中後，才交由他繪製並與奏摺及其他材料一起「裝潢成冊」。雖說奏摺與其所附的冊頁並沒有紀年，然而另一件王幼學《瑞樹圖軸》上有「庚午三月」紀年，如此看來，此行是否發生於乾隆十五年呢？很幸運地，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了六件與此行相關的檔案，對於我們釐清其具體時間和過程，提供了更為細緻的幕後記載。

四、調查行動的後臺

由乾隆御製詩與裝裱成冊、滿漢雙語並置之奏摺所顯示出的瑞樹調查過程，雖然已經充滿各種具體的細節，包括瑞樹尺寸、人員、行程等。然而，考量到最終呈現的形式，像是御製詩的寫作、滿漢兩體的翻譯，以及冊頁的裝裱等，無疑地是一個經過整理的敘述。但這項調查行動究竟是如何開始、如何成形？過程間難道沒有出現過任何困難與阻礙、衝突與協調？宮廷如何動員整個國家機制？這些實際的過程與最後正式呈現的資料之間，又有多少差距？凡此種種，則需仰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六件檔案加以釐清（附錄三至附錄八）。唯有掌握這些關鍵細節，我們才能進一步判斷，對於乾隆皇帝及其宮廷來說，調查一棵長白山的瑞樹究竟屬於何種性質的政治事件，並試圖傳達與呈現何種訊息。這六件檔案，除了第六件為漢文外，其餘五件皆為滿文。由於唯一的漢文檔上有十分凌亂且大量的詞句塗抹與修改痕跡，且內容基本上與巴思哈奏摺相符，故應是滿文奏摺的漢文譯稿之修改工作稿。至於五件滿文檔案，從第一件發於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八的上諭，到第五件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吉林副都統松阿哩上奏，擬遵病故者巴思哈之母意願，將其安葬於祖墳，清楚地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2011 年冬季號），頁 1-75。

展現整個計畫的發展過程。以下我將仔細解讀這幾份檔案，試圖重建調查任務實際執行的始末。

第一件檔號 03-18-009-000008-0003-0035〈為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畫匠前往寧古塔等地照例乘驛前往事〉為滿文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上諭(附錄三)，旨在派遣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領畫匠前往寧古塔等地繪畫，並請各地驛站配合，准其乘驛。雖說上諭中並無特別說明去寧古塔的時間，但是可以看到，在收到三月初八的上諭之後，軍機處馬上開始運作。

第二件檔號 03-0195-3520-011〈軍機處奏揀派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領畫匠赴吉林繪製奇樹片〉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片(附錄四)。奏片中並無具奏人與具奏時間，但由內容可以得知，乾隆派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前往吉林烏拉所管轄的地方，替該地所生長之有八種枝葉的樹木繪圖。具奏人仔細詢問路程與繪製所需時間，得知陸路 3,000 里，而水路也還要 3,000 里，粗估來回一趟所需時間約 150 日左右，遂建議應令巴思哈速速整裝並帶領畫匠，於乾隆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進入山區。

第三件檔號 03-0172-0683-001〈寧古塔將軍新柱為侍衛巴思哈等將赴烏蘇里江苾馨河給奇樹圖請為其備辦船隻事呈文〉(附錄五)。此檔案的前半段，為軍機處給寧古塔將軍的咨文，主要是為了巴思哈與王幼學前往寧古塔描繪樹木一事，咨請寧古塔將軍新柱與吉林副督統松阿哩，配合準備由寧古塔至烏蘇里苾馨河這段水路所需要的船隻、物料及人員，尤其是認識這棵樹木的當地嚮導。文中特別強調，京城到寧古塔一路皆有驛站，所以時間與行程都可以掌控，但水路可能會有阻滯，所以需要事先做好萬全的準備。檔案的後半段為寧古塔將軍新柱與吉林副督統松阿哩回應軍機處的咨文，報告其準備的狀況，包括已備妥進入此區域所需用到的滿洲獨木刀船(或稱威呼)及相關器械，以及派遣了一些認識這棵樹木的人去補撐駕威呼之船員的不足。所以，一旦巴思哈一行抵達寧古塔後，就可以馬上出發前往三姓地區。寧古塔將軍新柱上呈時間為四月初一。正如巴思哈正式奏摺所顯示的，這次行動建立在許多當地協助的基礎

上，尤其必須有認識這棵樹且知道路線的當地線人（local informants）領路。然而，巴思哈正式奏摺所點名的當地認路人，包括驍騎校向齊、披甲遮赫呀、閒散希呀稿，卻都不在籌備行程的咨文中。在軍機處給寧古塔將軍的咨文中，被點名的當地線人，反而是「領催達斯虎（Dashū）、披甲燦代（Candai）及燦代之叔父披甲喀爾濟（Kalji），又先前居住在畢歆河地方之恰喀爾氏（Kiyakar hala）等眾人」。由第二段寧古塔將軍回應的咨文可知，這些人選應該是巴思哈所指定的，而由下文即將介紹的檔案，我們也知道巴思哈之所以被指派擔任此項任務，正是因為他本來就來自寧古塔地區，³³所以對於當地的情形可能頗為熟悉。這些巴思哈指定的人手，最後都在三姓副都統，也就是巴思哈奏摺中提到的副都統富僧阿的協助下備齊到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巴思哈所指定的恰喀爾氏眾人（Kiyakar hala），很可能是乾隆朝《皇清職貢圖》所描繪的東北少數民族恰克拉（Kiyakara）。³⁴

至於巴思哈究竟於何時完成任務？真如原先預估的需要花到 150 天嗎？第四件與第五件檔案是關於調查任務負責人巴思哈。此行的任務顯然異常艱苦辛勞，巴思哈在調查期間就患病，拖著病體下山，最後還是不治，於寧古塔身亡。第四件檔號 03-0171-0275-014〈署理寧古塔將軍印務吉林副都統松阿哩為報欽派二等侍衛巴思哈於寧古塔病故情形事咨呈〉（附錄六），即為吉林副都統松阿哩於乾隆十五年八月一日報告巴思哈在寧古塔病逝的經過。三月二十日巴思哈一行人抵達寧古塔，隨即出發前往三姓地區、進入長白山區尋找瑞樹；巴思哈在回程時患病，七月二日拖著病體回到寧古塔。松阿哩仔細說明其如何盡職地照護，但巴思哈卻仍回天乏術的過程。除了其「不時親往探視」，且馬上指派「驍騎校那爾薩（Narsai）妥為照料」外，還貼心地安排巴思哈住在拉法（Lafa）地區的家人前來陪護照料。但即使有醫官的治療，很不幸地，巴思

³³ 〈署理寧古塔將軍印務吉林副都統松阿哩奏請欽派二等侍衛巴思哈於寧古塔病故，伊母請將其葬在祖墳地摺〉，《軍機處檔》，滿文奏摺，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具奏人：松阿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1-0275-017。

³⁴ 見〔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4，卷 3，〈恰喀拉〉，葉 13-14 上。

哈的病情仍在七月二十三日加重，於當天的未時（十三時至十五時間）病故。松阿哩規劃將其遺體透過驛站系統送到吉林烏拉，交給巴思哈胞弟及其子，然後送回京城，且特別提到侍衛病故本來應該具奏皇帝，然八月剛好是萬壽節期間，並不適合，因此僅先咨報，來月再行奏聞。

第五件檔案則是關於巴思哈的身後事，檔號 03-0171-0275-017〈署理寧古塔將軍印務吉林副都統松阿哩奏請欽派二等侍衛巴思哈於寧古塔病故，伊母請將其葬在祖墳地摺〉（附錄七）。巴思哈雖然已於七月二十三日亡故，但吉林副都統松阿哩一直等到八月十三日萬壽節後的八月二十六日才上奏。奏文雖然是關於巴思哈的母親請求能否不將其子的屍體送往京城，而是葬於位於吉林烏拉的祖墳，但是也因此可以得知，巴思哈原來就出身瑞樹所在的吉林地區，這應該也是乾隆選擇巴思哈作為此行統籌的主要原因。任務在身的巴思哈在當地去世，顯然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所以在地官員的報告可說是鉅細靡遺，包括請哪位醫生、找哪些人來看護、病情的時程等，皆極為詳細具體。特別的是，在皇上跟前服務的巴思哈返鄉出任務時身故，由於其家族多在當地，京城只有其媳婦與幼子，因此巴母希望可以將其就地合葬於祖墳，此實屬人情之常。是以乾隆對松阿哩還為此事上奏，在九月二十日的硃批中回批道「糊塗之至」，展現出情理通達的君王姿態。

總之，這趟調查乃由乾隆下令，透過軍機處動員寧古塔將軍等為巴思哈準備補給與後勤，組織了一支多達 38 人的隊伍。雖然不能確定乾隆十五年三月八日上諭發出後，巴思哈是否馬上啟程，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在三月二十日到達寧古塔後，隨即出發進入山區，歷經了小船、獨木舟與步行的艱辛過程，終於繪製出瑞樹的一手圖像，並採集到相關實物標本，最後於七月二日達成任務，回到了寧古塔，卻在七月二十三日病重身亡。假設巴思哈在三月八日一收到諭令便馬上出發，不計由寧古塔到北京的回程時間，也就是以三月八日到七月二日巴思哈回到寧古塔為計，則此趟任務共花了 112 天。唯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巴思哈在回程時即病故於寧古塔，那麼，我們一開始看到的《瑞樹圖冊》

所隨附之巴思哈報告此行經過的滿、漢兩體奏摺，又是怎麼回事？一下山就已經生病的巴思哈如何有機會撰寫奏摺？此奏摺果真是巴思哈的親身證詞嗎？

很幸運地，我們還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第六份檔案，檔號 03-0172-0683-010〈巴思哈奏聞往苾馨河地方為一怪樹繪圖之情形摺〉（附錄八）。此一檔案應該是巴思哈原始滿文奏摺的漢文翻譯工作稿，雖說很可惜地已看不到巴思哈滿文原奏，但至少漢譯草稿中的大量修改痕跡，可以讓我們知曉兩本《瑞樹圖冊》中正式的巴思哈奏摺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應該就是此工作稿最後一段遭刪除的文字：

~~「奴才巴思哈在三姓地方於六月十九日啟程，即於本日患病，至七月初一日抵寧古塔，傷寒重複，身體甚軟，不能如期行走」~~，僅將原（緣）由（一併繕）具摺交王幼學敬謹具奏。³⁵

上面畫線的部分即為被刪除的文字，括號內則是添改的部分。在刪除的文字中，巴思哈提到他於六月十九日由三姓地區啟程下山，似當天即感染傷寒，帶病上路，至寧古塔後，病情反覆以致身體虛軟，無法行走，因此將其調查過程繕寫成奏摺，交給同行的畫家王幼學帶回。換句話說，我們在冊頁上所見正式奏摺中的最後一句：「奉旨：著余省設色，並各種樹葉，裝潢成冊呈覽」，³⁶應該與巴思哈完全無關，而當是後來翻譯與改寫巴思哈原奏時所添加的。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負責翻譯巴思哈原奏，也不知道是誰對其進行刪改？但由奏摺檔號開頭 03 所代表的軍機處全宗檔看來，軍機處應該有經手此事。除了部分文辭修飾，以及刪除最後一段巴思哈關於患病的自述外，還有一些細節的省略及改動。總之，比較漢文翻譯草稿與編改後的巴思哈正式奏摺，可以看到正式奏摺雖然保留了大多數巴思哈所述敘的具體過程與觀察細節，但更仔細地看，編改的版本似乎更重視呈現親歷與見證瑞樹的存在及其神奇之處，而

³⁵ 〈巴思哈奏聞往苾馨河地方為一怪樹繪圖之情形摺〉，《軍機處檔》，漢文奏摺，具奏人：巴思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2-0683-010。

³⁶ 〈余省瑞樹圖·二冊〉，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卷 35，重華宮藏十二，本朝臣工書畫四，冊 4，頁 1849-1850。

非巴思哈如何規劃收集的方式，亦非強調所收資料是全面與客觀。因此，一些細節（包括剝取鳥皮、不同視角的瑞樹圖繪等）紛紛被刪除、減省，甚至修飾更動，以回應正式奏摺一開頭就強調的其奉命查看的是一棵「瑞樹」之宗旨。而巴思哈患病、由王幼學轉交奏摺一事，意味著主要見證者的消失，因此，即使此行另有其他旁觀者，對於以見證本質為核心述求的奏摺來說，仍可能產生效力上的疑慮。正因如此，此段內容遭到刪除，便不難理解。從草稿中所述奉命調查「一本數種枝葉之樹」，到《瑞樹圖冊》冊頁奏摺中所稱的「瑞樹」，我們似乎看到一棵「瑞樹」從無到有的「誕生」，但此一「誕生」究竟發生在何時？此樹又是被何人、在何時正式認定為「瑞樹」？是在兩本《瑞樹圖冊》冊頁製作之時、還是之前？此兩本《瑞樹圖冊》又是在什麼時候製作的呢？

五、製作「瑞樹」：從「八樣樹」到「瑞樹」

正如前述，目前至少留存三件與此調查直接相關並由宮廷畫家生產的圖像，分別為臺北故宮所藏王幼學畫《瑞樹圖軸》、北京故宮所藏余省與王幼學畫《瑞樹圖冊》、以及余省畫《瑞樹圖冊》。我們知道此調查成果應該在乾隆十五年七月才回報宮中，那麼，現存這些相關圖像的製作時間為何呢？根據《御製詩集》的編排來看，〈瑞樹歌〉應該作於乾隆壬申年（十七年，1752），且很可能是年初之時。³⁷也就是說，比起王幼學的調查與《瑞樹圖軸》上的紀年還晚兩年。那麼，同時擁有御製詩文與「庚午三月」紀年的王幼學畫《瑞樹圖軸》究竟作於何年？查閱記載宮中各種工坊每日交辦與工作內容的《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僅有兩條記載與宮中瑞樹圖的製作有關，一為乾隆十七年〈裱作〉所載：

³⁷ [清]清高宗，〈瑞樹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卷31，葉2下-3下。

（六月）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王幼學絹畫八樣樹畫一張，傳旨著交薩木哈裱大畫一軸，欽此。³⁸

另一為同年約略兩個月後〈記事錄〉所載：

八月初五日接得熱河來帖，內開八月初一日大學士傳奉旨著查王幼學隨八樣樹葉畫來的石頭樣呈覽。欽此。³⁹

前者提到裱「王幼學絹畫八樣樹」大畫一軸，從其材質與形式判斷，應該即是目前臺北故宮所藏王幼學畫《瑞樹圖軸》。進一步推測，王幼學很可能從長白山回來後，就根據其寫生繪製了這幅大畫，因此有了乾隆十五年的紀年。但令人困惑的是，紀年時間為「庚午三月」，然而三月八日時，巴思哈與王幼學甫承諭旨，三月二十日也才剛到達寧古塔，準備進入山區，如何在此時製作如此之大畫？因此「庚午三月」與其說是畫作完成的時間，還不如說是任務開始的時間。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這幅畫作很可能在乾隆十七年六月左右完成，因此才有送裱的紀錄，且此次送裱時，可能同時也加上了汪由敦奉敕敬書年初乾隆才完成的御製〈瑞樹歌〉。仔細檢視詩作可以發現，汪由敦所書御製詩旁四周，似有接縫線（附圖 1 右上），顯然原本應是書寫在另一幅絹上，再裱接到《瑞樹圖軸》的畫面上。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在《活計檔》中都還稱相關的畫作為「八樣樹」，也呼應了上述巴思哈原摺漢譯工作稿中並沒有出現「瑞樹」一詞，而僅稱之「一本數種枝葉之樹」的作法；換言之，「瑞樹」的稱呼，應該是要到乾隆寫作〈瑞樹歌〉的乾隆十七年才正式成立的。⁴⁰而上題有〈瑞樹歌〉的畫作，即使有乾隆十五年調查時的寫生手稿為基礎，實際製作完成時間，也應該要到乾隆十七年。

³⁸ 見〈裱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十二日。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下略），《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19，頁 34。

³⁹ 〈記事錄〉，收入《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頁 693。

⁴⁰ 〈王幼學瑞樹圖·一軸〉，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 43，御書房藏八，本朝臣工書畫四，冊 4，頁 2244。

王幼學所繪製的這棵被御製詩重新定位為「瑞樹」的奇木，出現在一件本幅高達 339.1 公分、寬達 197.8 公分的巨軸裡（附圖 1）。王幼學雖於絹本上以水墨皴法勾勒出樹幹與樹枝蒼老糾結的樹皮表面和盤錯的根部，然而整棵樹形筆直而對稱，呈現一種巍峨聳立且堂皇之感。相對於以中國傳統水墨皴線結組描繪出的樹身，樹葉則敷以石綠與石青之重彩，尤其在比較明顯呈圓形的白楊葉與楓葉形的遮勒穆期葉上，可以看到畫家特意以顏色模塑光影向背，展現一種對於不透明物質性的描寫，為乾隆朝宮廷常見的西法風格。值得注意的是，畫中所有的樹葉都完整而帶有石青、石綠寶石般的光芒，再加上樹身分布著從褐色到紫色的靈芝，遂使整幅畫呈現一種世間難見、美好而理想的氛圍。

王幼學其人，為「畫畫栢唐阿王玠」之子，因父親去世的緣故，早在雍正五年（1727）二月就已進宮頂替父親的位置繼續當差。⁴¹栢唐阿，為滿文“baitangga”的音譯，意指當差、打雜之人，在宮中的身分並不高。由《活計檔》可以得知，王幼學至少在乾隆元年（1736）前就已經是郎世寧的弟子與助手，協助郎世寧進行很多宮中的繪製計畫，有時並負擔教導外僱工匠繪製郎世寧風格作品的工作。例如，《活計檔》〈記事錄〉記載乾隆四年（1739）五月十三日「郎世寧起稿呈覽，准時著常保外僱匠人，交張維邦、王幼學代領指示同畫」。⁴²王幼學在宮中被稱為「畫油畫人」，⁴³並精通「通景畫」與「線法畫」等受歐洲影響的西洋畫法，⁴⁴《活計檔》中有許多他被交付繪製油畫的記載，而最受當今學者注意的，是他參與的倦勤齋天頂通景畫之製作。⁴⁵

有著乾隆御製詩的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附圖 2）與余省畫《瑞樹圖冊》（圖 3），一匣被稱為「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另一者則為「余省畫《瑞樹圖冊》」，然而，檢視紀錄，僅見《石渠寶笈續編》中載有〈余省瑞樹圖·二冊〉。兩套冊頁中唯一有王幼學痕跡之處，是在登記為余省

⁴¹ 見聶崇正，〈清宮廷畫家王幼學、王儒學兄弟〉，《紫禁城》，2011 年第 12 期，頁 86-90。

⁴²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頁 774。

⁴³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頁 418。

⁴⁴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頁 425；冊 33，頁 592。

⁴⁵ 見聶崇正，〈記故宮倦勤齋天頂畫、全景畫〉，《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3 期，頁 19-22。

與王幼學的封面上，有一應為古物陳列所的点檢標籤，印文為「名物鑑定真」，並有手寫「王幼學瑞樹分圖」的說明。比對完成於 1925 年的《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確實著錄有〈清王幼學余省瑞樹圖冊〉，⁴⁶換句話說，這兩匣冊頁的正確名稱應該是「余省瑞樹圖」，即實物標本與圖繪描述兩者合起來才為完整的一套作品。目前北京故宮的名稱，應為延續古物陳列所命名之誤。

實際比較畫風，被標為王幼學所繪分圖者，樹葉以淡墨沒骨描繪，並以褐色墨染出葉緣枯黃之態，葉脈的陰影處也以褐色墨處理，與臺北故宮所藏余省作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海西集繪冊》（附圖 6）或《嘉產薦馨冊》（附圖 7）如出一轍。因此，此冊分圖應該不是出自王幼學，而是余省所作。余省於乾隆二年（1737）正式入宮，⁴⁷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載：「著傳與海望，將畫畫栢唐阿王幼學除所食二兩錢糧，再新來畫畫人余省、余穉、周鯤等三名，每名每月賞給錢糧八兩。」⁴⁸此時余家兩兄弟顯然才剛入宮，與周鯤同時，一開始的工資為每月八兩，而後來參與瑞樹調查團的王幼學，還不過是一個僅領二兩工資的畫畫栢唐阿，位階遠不如剛入宮的余省。余省應該在蔣廷錫家為門客時即習得西洋技法，⁴⁹並在入宮約兩年後的乾隆四年十月十八日，被指派與「金穉、葉履豐、戴洪、盧湛來圓明園幫郎世寧畫畫」。⁵⁰余省顯然極得上意，乾隆六年（1741）七月初八《活計檔》〈記事錄〉中便有「金昆、孫祜、丁觀鵬、張雨森、余省、周鯤等六人一等，每月給食錢糧八兩」的記載，亦即余省在入宮四年左右就正式晉升為一等畫畫人，與他同時入宮的兄弟余穉還只是二等，可見其受乾隆皇帝之器重。⁵¹

⁴⁶ 何煜編纂，《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重印，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卷 4，葉 72 上-72 下。

⁴⁷ 關於余省如何由蔣廷錫門客進入宮廷，見賴毓芝，〈康熙朝宮廷「畫院」的運作與盛清院體的奠立：以蔣廷錫團隊為中心〉，《藝術學研究》，期 31，頁 34-36。

⁴⁸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頁 784。

⁴⁹ 關於蔣廷錫團隊對於清宮院體西洋風奠定的重要性，見賴毓芝，〈康熙朝宮廷「畫院」的運作與盛清院體的奠立：以蔣廷錫團隊為中心〉，《藝術學研究》，期 31，頁 1-106。

⁵⁰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頁 786。

⁵¹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頁 304。

余省對於西洋畫法的掌握，使得我們在《活計檔》中不時可以看到他被派去繪製具有幻影效果的通景畫、或是畫「假門」等的紀錄，⁵²而這樣的訓練，也應使其對於寫生駕輕就熟，乾隆御題其所繪製的《雜花草蟲》卷即言：「寫生有如此，傳神亦云得。」⁵³他雖然也能仿古，例如《國朝院畫錄》就記載乾隆題〈仿宣和三思圖〉言：「余省寫生手，倣摹亦稱頗。」⁵⁴然由「倣摹亦稱頗」來判斷，余省在宮中的主要定位，應該還是以傑出的「寫生手」為主。因此，宮廷所以指派余省繪製由長白山採集來的標本，主要的考慮應該是其能夠利用西洋技法來寫生。然而，不同於王幼學瑞樹巨軸裡的樹身與石塊，余省在個別樹葉的描寫上，是以沒骨彩墨細膩地暈染出葉面不同的光影與顏色變化，整體帶有水彩的透明感，尤其特意描繪葉面局部枯黃或蟲咬的痕跡。相對於王幼學理想化與類型化的樹葉描繪，余省更著意於呈現其所描繪樹葉的個別性，似乎要讓觀者認定：這就是巴思哈團隊所帶回來的那特定幾株樹葉。有趣的是，沒有實際赴長白山的余省，其所圖繪的根據，應該是已經乾枯無色的標本，理應看不出來哪一部分衰枯變黃，這些「如生」的個別性展現，很大部分應該是余省根據標本所復原想像而來的。

綜述始末，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派遣乾清宮二等待衛巴思哈帶領了包括他本人在內多達 38 人的團隊，前往長白山深處、鴨綠江支流畢叡河上游，實地調查一棵傳說中的瑞樹，同行者包括畫院待詔王幼學，主要負責圖像紀錄。整行人經過水路、陸路交替的長途跋涉，終於見到此樹，不但對其進行詳密的丈量、圖繪，並且收集標本實物。巴思哈同時也圖繪了沿途其他重要景觀、

⁵² 例如，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如意館〉載：「二十一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等押帖一件，內開為七月十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臨芳蓬頂，著余省畫通景花卉，填青地，欽此。」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頁 430；乾隆 16 年 9 月 20 日〈裱作〉載：「二十日，員外郎白世秀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宣紙、余省假畫門一張，傳旨著托紙，欽此。於本月二十一日，英敏將宣紙、余省假畫門一張，托得紙，持進貼訖。」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頁 215 等。

⁵³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收入中國書畫研究社編，《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冊 3，卷上，葉 15 上-下。

⁵⁴ 〔清〕清高宗，〈余省仿宣和三思圖〉，《御製詩集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3，卷 4，葉 4 上。

地圖，以及採集當地特殊的鳥類標本。此項任務由當時的政治決策與行政中心軍機處下令，由寧古塔將軍負責所有人員的調動與後勤準備，特別是招募熟悉當地地形與認得此棵樹木的當地少數民族作為引路人。巴思哈很可能在三月八日收到諭令後馬上出發，及至七月二日回到寧古塔，整趟任務共花了 112 天。然而，回到寧古塔的巴思哈病倒並不幸去世，去世前，他把任務報告寫成奏摺，請王幼學帶回。王幼學回到宮中後，除了將巴思哈的任務報告上呈，也以自身的寫生稿本為基礎，在宮中繪製絹本大畫《瑞樹圖軸》，當中混合了以線描為主的中法和以敷彩模塑向背為主的西法，應該是受到乾隆皇帝精確的指示。此畫在乾隆十七年御製詩完成後的數月送裱，推測也應該在同年完成裝裱。而有御製詩的兩套冊頁，應該也在此年完成。兩者的主圖瑞樹部分，皆有余省簽款，應該都是余省根據王幼學的稿本而作。至於第二冊部分，一套為實物、一套為圖繪，兩者在構圖、位置、形態上完全對應，其中圖繪的部分，應該是以「寫生」著稱的余省對著乾枯的標本想像重建出植物的活體狀況，甚至，為了增加具體採集植物的實體與獨一無二感，余省還加上很多蟲咬或枯黃的樹葉表現。

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兩匣冊頁上所見到的巴思哈正式奏摺，事實上是王幼學所帶回的巴思哈滿文原奏摺為本，經翻譯並刪裁改寫而成。此調查任務在經過刪裁改寫後，不僅從原先的調查「一本數種枝葉之『樹』」，正式被定位成「奉命察看畢歆河『瑞樹』」，而且樹的高度也因用詞上處於滿漢互譯的模糊地帶，變得益加高聳巨大。更改的時間，應該是在乾隆〈御製瑞樹歌〉寫成與相關畫作裝裱的乾隆十七年，而巴思哈奏摺應該也在此時被改寫。經過一連串的重新模塑，矗立在畢歆河的巨樹，不再是原任務指示中「一本數種枝葉之樹」，也不是裝裱時所稱的「八樣樹」，而是御製詩中所清楚題名的「瑞樹」。至於臨終自言無法親自回到宮中覆命的巴思哈，則在冊頁裡被調整過後的正式奏摺中，再度復活，成為見證此奇特瑞樹存在之人及主要發聲者。

六、翻譯與命名

話說，一本有八種樹葉的樹會是什麼樣的樹呢？而此八種樹又各自屬於什麼品種？像這樣八種樹共生於一株主幹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呢？根據附於冊頁內的巴思哈正式奏摺所述，「其樹本如小葉楊樹，而質直理堅」，而另外七種為「果松者、若檜木、樺木者，有若密克特木、遮勒穆期木者，有若白榆、樺皮者」。乾隆御製詩所列舉的名稱則稍稍不同，為「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⁵⁵兩相對照下，乾隆所稱的「紫樺」，很可能即是巴思哈所稱的「樺皮」；乾隆稱之為「白樺」者，則可能是巴思哈所稱的「樺木」；至於巴思哈以為是本樹葉的「小葉楊樹」，應該就是乾隆所稱的「白楊」（不同文獻的不同物種名稱及可能的現代命名，見附錄九）。

北京大學博物學專業的王釗在其博士論文中，根據冊頁內的標本與圖像，認為此八種樹分別是現在稱為髭脈槭、碩樺、臭冷杉、紅松、鵝耳櫟、白樺、花楸、大青楊的喬木（附錄十）。⁵⁶如此看來，似已輕易地解決此八種樹葉究竟是哪八種樹的問題，然而，果真如此簡單嗎？植物學家基本上是利用外觀來辨別和鑑定植物，但同一物種內關鍵且穩定而不變的特徵，在不同植物與生物類群中都很不一樣，這需要經驗的累積且觀察植物不同階段、不同部位的形態，包括開花、結果等樣貌，才能判定。因此，單就一枝樹葉標本便想要完全確定物種，事實上常有諸多困難，而這樣的困難，並非僅存於現代世界，即使在巴思哈的時代，要辨認長白山上的植物，也必須倚賴對當地植物有豐富經驗的少數民族。而根據檔案記載，我們知道任務一開始啟動時，寧古塔將軍即應軍機處的要求，去找尋當地「認識樹木之舊眾人」，以協助辨認樹木。⁵⁷然而，

⁵⁵ 〈王幼學瑞樹圖·一軸〉，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43，御書房藏八，本朝臣工書畫四，冊4，頁2244-2245。

⁵⁶ 王釗，〈觀乎動植：康乾時代的清宮博物繪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8），表2-1，頁65。見附錄十。本文據此資料進行相關討論及商榷，以下不再重複贅引。

⁵⁷ 〈寧古塔將軍新柱為侍衛巴思哈等將赴烏蘇里江苾馨河給奇樹圖請為其備辦船隻事呈文〉，《軍機處檔》，滿文咨呈，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一具奏，具奏人：御前侍衛鎮守寧古塔等地將軍（吉

問題在於，即使找到了樹木，辨認出其在當地的名稱，但要如何將當地的名稱對應回滿文，甚至再對應回漢文世界中的名稱與物種？事實上有諸多需要商榷、或甚至無法確定之處。

由巴思哈原奏漢文譯稿中的塗抹與修改痕跡，便可以看到這些斟酌考量與難以抉擇的過程。例如，當巴思哈談到終於看到此一非比尋常的大樹後，要如何仔細辨識上面到底有哪些不同的樹葉時，我們在譯稿中便可以看到，原本書有「□松」之處，前面有一個無法辨認的漢字被刪除掉，被改為「菓松」，而原先譯為「杉松」者，也被改為「檜木」（附錄八、附圖 14）。「杉松」與「檜木」所對應的滿文原文皆為“saksin”，雖然根據安雙成的《滿漢大詞典》、胡增益的《新滿漢大辭典》、或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以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御製五體清文鑑》及《五體清文鑑譯解》為基礎所輯作之《滿漢和》等滿漢辭典的歸納，它可以同時指稱「杉松」、「杉」、「杆松」、「檜」等，⁵⁸而《滿漢和》甚至將其直接解釋為「檜」。然而，如果查閱康熙朝的《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可以發現「杆松」與「檜」事實上分屬不同的詞條，⁵⁹故不知《滿漢和》以「檜」來釋義「杆松」，所據為何？「杆松」在《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中，被放在卷七十主要談論「松」的附錄，其言：「杆松一名白松，生塞外汗帖木兒嶺，五臺亦有。其幹直上，枝葉如盤，下枝長，以上漸短，遠望無異浮圖，其體最輕，商人取之，運至通州。」⁶⁰因杆松生長在塞外，為中文史籍所無，故放在附錄，且很可能是新創的漢詞。《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實際上並沒有滿文本，我們並不知道其所對應的滿文名稱為何。而滿文“saksin”被正式對應到漢文的「杆松」，則一直要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

林將軍騎都尉一次記錄新柱（Sinju）、鎮國將軍副都統（吉林副都統）記錄八次宗室松阿哩（Sungari），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2-0683-001。

58 日本東北大學的滿洲語辭典：<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manchu/list?groupId=11>（2021年5月20日檢索）。請在線上字典輸入“saksin”。

59 「杆松」在卷 70，而「檜」在卷 71，詳見〔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7，卷 70，葉 30 下；卷 71，葉 27 上-47 下。

60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0，葉 30 下。

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才成立，⁶¹之後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與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御製五體清文鑑》也延續此翻譯。⁶²

巴思哈的滿文奏摺在譯為漢文時，還需要在「杉松」與「檜木」間斟酌改動，顯示在進行瑞樹調查的乾隆十五年之際，滿文“saksin”究竟要對應漢文中的哪一個詞，仍極混亂而不穩定。滿、漢對譯的不穩定及混亂，的確造成溝通上很大的問題，而這也正是乾隆十二年（1747）起就可以看到的一連串新清語的制定與頒行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⁶³這不僅僅只是製造新詞，而是要先確定滿、漢兩個世界是否存在著語言不同卻指涉同一件事情的詞彙。如何將兩個分屬不同世界的舊詞對接起來，是一個極度困難的挑戰，牽涉到兩個文化知識體系如何對應與對接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並非巴思哈與其翻譯者所獨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布雷克（John Bradby Blake, 1745-1773）在廣東收集物種時，也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在面對要英譯當地的植物的中文名稱時，布雷克不斷地自問“Is not this?”（附圖 8），⁶⁴其所面對的首要難題，即是在中國看

⁶¹ [清] 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3，卷 29，葉 22 下。

⁶² [清] 阿桂等奉敕撰，《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卷 28，葉 19 下；[清] 清高宗敕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冊下，頁 4019。

⁶³ 康熙朝對於滿文世界所沒有的中文詞彙，多採用音譯的方式，因此在翻譯上常致混亂不明。乾隆朝則開始規範滿、漢文一對一的詞語關係，頒布一系列新製的新清語，參見佟永功、關嘉祿發表、後由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定的〈乾隆朝「欽定新清語」〉系列文章，共十一篇，刊在《滿語研究》（1993-2005 年間），主要從遼寧省檔案館藏《黑圖檔》及《盛京內務府檔》摘錄有關乾隆皇帝親自規範滿語，並頒布上諭推行之「欽定清語」方面的檔案。見佟永功、關嘉祿，〈乾隆朝「欽定新清語」探析〉，《滿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66-70；張虹、程大鯤、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一）至（十一），《滿語研究》，依次載於 1993 年第 2 期，頁 79-84、55；1994 年第 2 期，頁 68-77、50；1995 年第 2 期，頁 51-58；1996 年第 2 期，頁 31-38；1997 年第 2 期，頁 37-44、59；1999 年第 2 期，頁 32-43；2000 年第 2 期，頁 26-33；2001 年第 2 期，頁 83-88；2003 年第 1 期，頁 33-40；2004 年第 2 期，頁 66-76；2005 年第 1 期，頁 41-48。

⁶⁴ Descriptions and Index to Volume 1 on Drawings of Chinese plants and fish by native artis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ohn Bradby Blake (1745-1773) (M-152), John Bradby Blake Archive,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 pdf., p. 36. 此檔案未公開，請聯繫：<https://www.osgf.org/john-bradby-blake>。如何命名植物，或把所見的植物與所知的名稱對應起來，並不是大航海時代以後才有的問題，而是大航海時代後此問題變得更為複雜而困難。關於林奈分類法出現之前，歐洲如何面對與解

到的這種植物，是否是其所熟悉的英文植物學體系中的某某植物？抑或是一個新的物種？要給它一個新命名？還是要找出對接的英文舊名？而這也正是生物分類學之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與其分類法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尤可玩味的是，巴思哈奏摺的譯者並沒有採用早在康熙朝《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就已經出現的「杆松」來對應“saksin”。其為何選擇「杉松」與「檜木」兩個詞彙來翻譯“saksin”？最後又如何決定僅取用「檜木」一詞？其所據究竟為何？倘若檢視此次任務所有的檔案資料，尤其是巴思哈的奏摺，便會發現它們雖然對於調查的過程有很詳盡的描述，但是對於瑞樹所包含八種樹種的外形，卻幾無著墨。因此，當人們對於“saksin”究竟該如何翻譯還莫衷一是之際，巴思哈此次任務所帶回的標本與圖繪，幾乎成為漢文翻譯者連結“saksin”與「杉松」或「檜木」唯一的憑藉。

由《瑞樹圖冊》中的標本與圖繪判定，最後被翻譯定名為「檜木葉」者，是由針狀葉所組成，斜上生長，針狀葉尾端漸尖，且中間有一道格外明顯的葉脈，樹枝略帶粗糙的質感。譯者原將其翻譯為「杉松」，似乎不無道理，因為在現代植物學中，的確有名為「杉松」（*Abies holophylla*）者。根據《中國植物志》的物種描述：「喬木，高達 30 米，胸徑達 1 米……葉在果枝下面列成兩列，上面的葉斜上伸展，在營養枝上排成兩列；條形，直伸或成彎鐮狀，長 2-4 釐米，寬 1.5-2.5 毫米，先端急尖或漸尖」，⁶⁵樹葉的特徵描繪與其採集之標本，確實與《瑞樹圖冊》圖繪及標本所呈現的樣貌非常接近（附圖 9）。⁶⁶更重要的是，杉松分布的區域，在「東北牡丹江流域山區、長白山區及遼河東部

決這個問題，見 Anna Pavord, *The Naming of Names: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5).

65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卷 7，頁 69，線上版：<https://www.iplant.cn/info/Abies%20holophylla?t=z>（2025 年 6 月 6 日檢索）。

66 標本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設立的標本資料庫「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由江蘇省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所藏，採集於黑龍江者：<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da886181>（2021 年 5 月 20 日檢索）。

山區，在海拔 500-1200 米」，⁶⁷正是瑞樹生長的範圍，且其「常組成針葉林或針葉樹與闊葉樹混交林。混生樹種有：紅松、臭冷杉、紅皮雲杉、長白魚鱗雲杉、黃花落葉松、大青楊、楓樺、春榆、裂葉榆、山楊、糠椴、黃檗、胡桃楸及水曲柳等」，⁶⁸凡此種種，也跟王釗所辨認出瑞樹所包含的其他八種樹，包括髭脈槭、碩樺、臭冷杉、紅松、鵝耳櫟、白樺、花楸、大青楊等有諸多疊合，它們都是長白山區混生林中可能出現的物種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王釗並沒有採用譯文中所辨認出的「杉松」，而將其訂為「臭冷杉」（*Abies nephrolepis*）。根據《中國植物志》的物種描述，臭冷杉為「喬木，高達 30 米，胸徑 50 釐米……枝條斜上伸展或開展，樹冠圓錐形或圓柱狀……葉列成兩列，或在果枝及主枝上面的葉斜上伸展，下面之葉列成兩列，稀枝條下面及上面的葉均為斜上伸展，葉條形，直或彎鐮狀，長 1-3（常為 1.5-2.5）釐米，寬約 1.5 毫米」。⁶⁹檢視現存採集標本及葉狀特徵的描繪，同樣很接近《瑞樹圖冊》中的標本與圖繪（附圖 10），⁷⁰再考慮其生長區域為「東北小興安嶺南坡、長白山區及張廣才嶺海拔 300-1,800 米，河北小五台山、霧靈山、圍場及山西五台山海拔 1700-2,100 米地帶」，⁷¹且「在吉林山區和長白山區海拔 500-1,800 米地帶，常與紅松、紅皮雲杉、杉松、長白魚鱗雲杉、東北紅豆杉、黃花落葉松、黃檗、朝鮮楊、白牛槭、檉筋槭、胡桃楸及糠椴等針葉樹、闊葉樹混生」，⁷²也同樣大致符合此瑞樹的物種組合。那麼，《瑞樹圖冊》中標為「檜木葉」者，究竟是杉松？還是如王釗所訂的臭冷杉？杉松與臭冷杉同屬松科冷杉屬植物，兩者生長環境相似，且於長白山區常常混生一

⁶⁷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69，線上版：<http://www.iplant.cn/info/Abies%20holophylla?t=z>（2021 年 5 月 31 日檢索）。

⁶⁸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69。

⁶⁹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74，線上版：<https://www.iplant.cn/info/%E8%87%AD%E5%86%B7%E6%9D%89?t=z>（2025 年 6 月 6 日檢索）。

⁷⁰ 標本見於「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資料庫，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所藏，採集於吉林省者：<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ecadd136>（2021 年 5 月 20 日檢索）。

⁷¹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74。

⁷²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74。

處，因此，即使其樹形與毬果等細節有所差異（附圖 11），但若是辨別物種時缺乏這方面的資訊，縱然有極具描繪性的樹葉圖像與標本，恐怕還是無法作最後的判定。

既然被標為「檜木葉」者有可能是臭冷杉，也同樣有可能是杉松，那麼，是否也有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檜木」？在臺灣的語境中，所謂的檜木，常常指的是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與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兩者都是柏科扁柏屬，與同屬松科冷杉屬的臭冷杉與杉松有所差異，且紅檜還是臺灣特有種。紅檜與扁柏幼時皆呈針狀葉，但後來會長成鱗片狀葉。然而在中國植物學中，「檜」被認為是指柏科刺柏屬的圓柏（*Juniperus chinensis* L.），⁷³就葉子來說，同樣也是嫩葉呈刺狀，但葉片卻會隨著生長而成為鱗狀。由於《瑞樹圖冊》中的「檜木葉」看來是針狀葉，不免讓人疑惑究竟是因其為幼樹葉？還是根本與「檜木」無關？但考慮到巴思哈奏摺漢譯草稿中提到「菓松、杉松檜木二種徑圍如碗」（附錄八，圖上左最末行、圖下右第一行），應該已經不是幼樹苗狀。設若其真為圓柏，則成葉應已為鱗狀。由此看來，《瑞樹圖冊》中被標為「檜木葉」者，很可能跟我們現在所指稱的檜木無關。

然而，即便被標訂為「檜木葉」者，跟現代植物學中的「檜木」沒有關係，在清代的文本中，是否有可能被視為「檜木」？釐清此一問題，才能解釋為何巴思哈奏摺的譯文要將其從「杉松」改為「檜木」。什麼是「檜」？最早明確地以外形定義何謂「檜」者，應該是西元前二世紀的《爾雅》所言：「檜，柏葉松身。」⁷⁴宋代羅願《爾雅翼》更細微地區分道：「檜，今人亦謂之圓柏，以別於側柏。又有一種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柏，一枝之間屢變，

⁷³ 「圓柏」，原本學名為 *Sabina chinensis*，經修訂後，以 *Juniperus chinensis* 為植物學中的接受名。被認為就是《詩經》中所說的「檜」，見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362，線上版：<https://www.iplant.cn/info/Sabina%20chinensis?t=z>（2021 年 5 月 31 日檢索）。

⁷⁴ 〈釋木第十四〉，《爾雅》，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冊 1139，卷下，頁 109。

人家庭宇，植之以爲玩。」⁷⁵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清楚地整理前人說法，指出：「柏葉松身者，檜也。其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柏，以別側柏。松葉柏身者，樅也；松檜相半者，檜柏也。」⁷⁶換句話說，現代植物學中「檜即是圓柏」的說法，至少早在宋代即已確立。根據現代《中國植物志》的物種描繪，柏木（*Cupressus funebris*）葉乃「生鱗葉的小枝扁，排成一平面」（附圖 12），⁷⁷顯然與《瑞樹圖冊》的標本與圖繪中的刺狀葉不同。然而，「柏」者，根據清代以前的文獻，如李時珍《本草綱目》便說「葉扁而側生者」爲側柏。⁷⁸至於被視爲檜木的圓柏，則是「其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柏，以別側柏」，⁷⁹亦即其葉是尖硬的。清代《御定淵鑑類函》說得更清楚，指出側柏之葉「如鋪茸」，⁸⁰而作爲圓柏的檜葉則是「尖硬如芒刺」，⁸¹前者指的當爲鱗狀葉，後者則應是指刺狀葉。換句話說，在清代以前的文本中，所謂檜木「柏葉松身」的葉子，並非現代植物學中的鱗狀葉，而被認爲是針狀葉。

有趣的是，如果單憑葉形來判斷，杉木的葉子在本草文本中也常被認爲是「若刺針」，其與檜的差別在於，檜木被視爲「松身」，而杉卻是「類松而徑直」，⁸²比起松樹更爲端正挺拔。這樣的差別，可以清楚地在四庫全書本的《本草綱目》中見到（附圖 13）。⁸³然而，在僅僅握有少數樹枝與葉形的圖繪與標本，但缺乏最關鍵樹身資訊的情況下，譯者如何判定《瑞樹圖冊》上的標本或圖繪爲「檜」，而非「杉」或是被改掉的「杉松」呢？在清代分類的概念下，應該是非常難以確定的。

⁷⁵ [宋]羅願撰，石雲孫點校，《爾雅翼》（合肥：黃山書社，1991），卷 9，頁 95。

⁷⁶ [明]李時珍，〈柏〉，《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4，卷 34，葉 2 上。

⁷⁷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336，線上版：<https://www.iplant.cn/info/Cupressus%20funebris?t=z>（2021 年 5 月 31 日檢索）。

⁷⁸ [明]李時珍，〈柏〉，《本草綱目》，卷 34，葉 1 上。

⁷⁹ [明]李時珍，〈柏〉，《本草綱目》，卷 34，葉 2 上。

⁸⁰ [清]清聖祖御定，張英、王士禛、王掞等編纂，《御定淵鑑類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93，卷 413，葉 1 上。

⁸¹ [清]清聖祖御定，張英、王士禛、王掞等編纂，《御定淵鑑類函》，卷 413，葉 1 下。

⁸² [明]李時珍，〈杉〉，《本草綱目》，卷 34，葉 13 上。

⁸³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2，圖卷中之下，葉 48 上。

在無法確定的情況下，為何最後還是決定要將其改稱「檜木葉」呢？康熙朝所編的《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乃是根據明代王象晉的《群芳譜》增刪而成，文本內清楚地標誌《群芳譜》的「原」文本，或增補部分的「增」文本。在〈木譜〉「柏」部的附錄有「檜」條，除《群芳譜》原引自《爾雅》的內容外，《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增加了上述《爾雅翼》等引文。⁸⁴值得注意的是，《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援用了原來《群芳譜》提到曲阜孔廟檜木的一段文字：「曲阜孔廟殿前宣聖手植檜，紋皆左紐上聳，無枝而不朽，每遇一代興，或聖君出，則發一枝。我朝太祖龍興、世宗繼統，曾兩見，真大異事。」⁸⁵亦即，曲阜孔廟前的檜木為孔子所植，其樹瘤的紋路都是左旋上升，沒有分枝且不朽，每次遇到聖君出世，就會新發一枝，明太祖與明世宗時都曾經出現過此異象。《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在此段文字後特別補上康熙的〈御製闕里古檜賦並序〉，提到一相傳為孔子所植的檜木，在「金貞祐間無復存矣。元至元三十年（1293）再茁故處，明宏〔弘〕治間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⁸⁶康熙曾親訪孔子闕里見證此檜，並特作此賦。《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不僅補錄康熙御製詩，且增補了唐代溫岐（溫庭筠）〈再生檜賦〉，賦文開宗明義地提到：「檜有再生之瑞，天符聖運之興」，⁸⁷檜木顯然被認為與朝代興亡及聖君出世的徵兆息息相關。尤其康熙認為此樹「植非出於文宣」，⁸⁸並以「大椿讓兮千齡」指稱此樹應該比傳說中的大椿要老上千歲，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乾隆〈瑞樹歌〉中「大椿徒傳八千歲，較此奚啻父視兒」一句（附錄一），即使乾隆〈瑞樹歌〉不一定是直接回應康熙的〈御製闕里古檜賦〉，然而古檜萌芽作為帝王德政之瑞徵，無疑地在清宮已成為檜

⁸⁴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7，卷 71，葉 27 下。

⁸⁵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1，葉 30 下-31 上。

⁸⁶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1，葉 31 上。

⁸⁷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1，葉 32 上。

⁸⁸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1，葉 32 上。

木的主流意象。因此，巴思哈奏摺漢譯中捨「杉松」而改為「檜木」，是否與此瑞徵意象有關，應該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如果說將“saksin”的翻譯從「杉松」改為「檜木」，是利用樹種辨認難度所創造出來的模糊空間進行有利的修辭，那麼「密克特木」與「遮勒穆期木」的例子，則說明了因跨語言與文化之物種辨認的困難所創造出來的空間。一方面，翻譯中另創譯名，可能導致兩種語言的知識體系無法接軌，或選擇不接軌。如此一來，原本可對應的植物，便因譯名的更換而成爲在目標語中全然陌生的物種，最終與原物種脫節，成爲無交集的平行存在。另一方面，「密克特木」與「遮勒穆期木」究竟是什麼樹呢？巴思哈或後來奏摺的漢譯者，似乎都無法肯定。我們可以看到漢譯稿中，翻譯者因爲不知道如何翻譯，或將其對應到漢文的樹名，因此直接留下滿文（附圖 14，圖右下局部放大者）。而滿文拼音“mikte”與“jelemki”，在滿文中也不是任何具有意義的字，很可能爲當地人所告知的樹名，巴思哈遂直接用滿文拼出當地發音的樹名。進行漢文翻譯時，譯者不僅難以從滿文音譯推知其原本所指的樹種，甚至也無法藉由標本或圖像確認其對應的漢文樹名，因而只能將滿語音譯爲漢語。

回過頭來仔細檢視冊頁中的乾枯標本與彩色圖繪，「密克特木」與「遮勒穆期木」究竟是什麼樹呢？王釗認爲，「遮勒穆期木」應該是髭脈槭（*Acer barbinerve*），別名簇毛楓，爲無患子科槭屬。《中國植物志》描述其特徵與產地爲：「落葉小喬木，高約 5-12 米……葉紙質，外貌近於圓形或卵形，長 5-8 釐米，寬 4-7 釐米，基部心臟形或近於心臟形，5 裂」，「產黑龍江、吉林、遼寧。生於海拔 500-1,200 米的疏林中或林邊。蘇聯西伯利亞東部和朝鮮北部也有分布。」⁸⁹由此描述及其產地看來，髭脈槭的確有可能是《瑞樹圖冊》中的「遮勒穆期木」。然而，東北地區事實上還有其他同屬無患子科槭屬下的其他類似物種，例如，小楷楓（*Acer komarovii*），葉子呈「紙質，外貌長圓

⁸⁹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卷 46，頁 241-243。

卵形……基部心臟形或近於心臟形……常 5 裂，稀 3 裂」，⁹⁰「產吉林、遼寧。生於海拔 800-1,200 米的疏林中」。⁹¹進一步檢視標本照片，⁹²與「遮勒穆期木」也頗為接近（附圖 15、16），所以，「遮勒穆期木」是否也有可能是小楷楓？再進一步細究，我們可以發現，髭脈槭與小楷楓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小楷楓「當年生枝紫色或紫紅色，多年生枝紫褐色或紫黃色」，⁹³而髭脈槭「當年生枝淡綠色，被稀疏的微柔毛；多年生枝淡綠色或黃褐色，無毛」，⁹⁴此種顏色上的差異，顯然在標本上完全無法判定。然而，檢視余省所繪的「遮勒穆期木」圖像，可見其以近似西洋水彩的沒骨筆法，刻畫出葉脈附近較深的光影，藉此呈現葉面，而枝條嫩綠的特徵，明顯與小楷楓不符。由此，可以看到圖像成爲提供關鍵性訊息的重要平臺。

在此要提醒的是，本文並非一部植物學的論著，我也無意推翻具有植物學或博物學專業背景學者的物種辨認，我只是要指出，跨文化與跨語文的物種名稱辨認及翻譯，事實上存在著許多模糊且難以跨越（也因此可以操作）的空間。標本看似是最「真實」的一手存在，但是從某種角度來說，卻又是極其片段的的存在，畢竟它僅僅是某時、某地採集得來的局部物種，缺乏樹形、枝幹、高度與其他季節樣貌等訊息，甚至沒有標本本身原生的顏色與姿態。而繪製的圖像則畫下標本還未變成「標本」時，植物活生生時的顏色、生長樣貌，成爲負載記錄、儲存資訊的主要媒介。更確切來說，就此項研究而言，重點不在於此八種樹究竟「是」什麼物種？而是在清宮的脈絡中，這八種樹「如何」變成中文世界中的「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

以「遮勒穆期木」來說，令人好奇的是，當此樹名從滿文翻譯成漢文時，爲何不以類似葉形的中文樹種名稱來稱呼，而採用直接音譯的方式呢？例如，

⁹⁰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46，頁 227。

⁹¹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46，頁 229。

⁹² 華中農業大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藏，採集於湖北省，見於「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資料庫，<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f35d4dbf>（2021 年 5 月 20 日檢索）。

⁹³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46，頁 227。

⁹⁴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46，頁 241。

在成書於十五世紀初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所編的《救荒本草》中，即收有槭樹（附圖 17），其「葉狀類野葡萄，葉五花尖」。⁹⁵在沒有其他花、果、或產地等特徵輔助的情況下，巴思哈冊頁中的標本與圖像，為何沒有被熟悉漢文世界植物名稱的翻譯者轉譯成《救荒本草》中的槭樹，而是翻譯成一個在漢文世界中沒有意義且無法連接回實際熟悉物種的音譯名稱？再舉「密克特木」為例，其樹葉呈披針形，葉緣單鋸齒，奇數一回羽狀複葉，王釗認為乃花楸。花楸並非長白山獨有種，在中國其他區域也可以看到，上述朱橚所編的《救荒本草》中即有花楸樹，「生密縣山野中，其樹高大，葉似回回醋葉微薄，又似兜櫨樹葉，邊有鋸齒，其葉味苦。救飢，採嫩芽葉燉熟，換水浸去苦味，淘洗淨，油鹽調食」。⁹⁶檢視所附圖像（附圖 18），雖然樹葉與樹幹的比例失真誇大，但橢圓有鋸齒的奇數羽狀複葉特徵，的確與巴思哈冊頁中的「密克特木」近似。如果圖像與標本等形式乃決定與連接翻譯兩端世界的唯一憑藉，那麼譯者不選擇形狀類似的槭樹或花楸為其譯名，是否有其他原因？槭樹或花楸在清代、甚至清宮的語境中，究竟又是什麼樣的植物呢？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亦載有槭樹詞條，並引唐人蕭穎士的詩序，說槭樹「與江南楓形胥類」。⁹⁷而楓樹正是因為其秋天變色與落葉的特性，成為很多詩人感傷歲月流逝與傷秋悲春的典型借物。翻開《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我們就可以看到過去文學作品中相關例句的集合。例如，杜甫的「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使者雖光彩，青楓滿地愁」等。⁹⁸這些「愁」、「歎」等非正面吉祥的意象，是否也是譯者不直接以楓或槭來對翻「遮勒穆期」的原因之一？至於花楸，很可能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由《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所收集的資料看來，楸是一種實用的樹木，《述異記》稱其「可為什器」。⁹⁹作為一種可用之材，關於楸最有名的形象，應該是《莊子》所提到的：「宋有荊氏者，宜

95 [明]朱橚撰，《救荒本草》，卷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0，葉21下。

96 [明]朱橚撰，《救荒本草》，卷5，葉31上-下。

97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75，葉13下-14上。

98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75，葉10下-上。

99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75，葉2上。

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¹⁰⁰楸跟柏桑這些有用之材，正是因為其可用之處，而在長到一定大小時，被斬而用之，「故未終其天年」，¹⁰¹莊子因此感嘆道：「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¹⁰²楸作為「中道之夭」的例子之一，顯然也不具有正面而吉祥的寓意。

對於吉兆寓意的重視，不僅見於由「杉松」改到「檜木」等關於譯名的選擇中，即使在看似「客觀」的圖繪中，也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例如，〈果松葉〉一開，畫家以褐色皴擦出樹枝，再以深淺不一的綠色沒骨畫出針狀的樹葉。圖中有三顆毬果，兩顆並蒂稍小，另外一顆體積較大，且幾乎已經全開，呈現成熟甚至近乎凋謝狀。畫家以墨線勾勒輪廓，並以褐色赭石顏料敷色，其上再點綴礦物性的石綠顏料，整體配色有青綠神仙山水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此樹種果真是王釗所辨認出的長白山區所產紅松（*Pinus koraiensis*）（附圖 19），那麼根據《中國植物志》，其花期在六月，毬果要到第二年的九至十月才會成熟。¹⁰³乾隆派巴思哈去長白山調查的時間是農曆三月八日到七月二日，也就是西曆的四月十四日到八月三日，此時紅松幾乎不可能有毬果。但很可惜的是，檢視《瑞樹圖冊》實體標本部分，〈果松葉〉那開上面的標本，幾乎已掉損不存，無法確認其是否包含毬果。然若考慮到冊頁的厚度，則幾乎可以確定事實上不可能夾入即使是壓扁的毬果。總之，就季節與裝幀而言，巴思哈所上呈的標本應該沒有紅松的毬果，那麼，照理說應是「記錄」所採集到標本的「圖」，為何又加繪上毬果呢？此開中的「果松」為滿文“holdon”的翻譯（附錄二），但此一字的滿、漢對接要到乾隆三十六年《御製增訂清文鑑》才確定，不知道乾隆十五年時譯者究竟為何選擇「果松」這一譯名？因為《御

100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5，葉 1 下-2 上。

101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5，葉 2 上。

102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75，葉 2 上。

103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頁 213。

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木譜〉中的「松」條目如此說明道：「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從公。礫砢多節，盤根膠枝，皮羸厚，望之如龍鱗。四時常青，不改柯葉。三鍼者為栝子松，七鍼者為果松。」¹⁰⁴這段文字來自晚明的《二如亭群芳譜》，因此三針者稱栝子松，而七針者稱果松，應該是當時中文世界的理解。檢視圖像，余省用深淺不一的綠色淡彩畫出松針雜聚的樣貌，似乎沒有特別展現三針或七針的區別。由於實體標本部分已經殘損，看不到松針到底是三針還是七針一束，但如果真如王釗所斷定的為「紅松」，則根據《中國植物志》，紅松為「針葉五針一束」，¹⁰⁵既不是三針，也不是七針。不知道余省是否不瞭解中文脈絡中「果松」僅是松樹的某一名稱，而非帶果的松樹？不管如何，加繪了毬果的紅松，配合青綠山水式的用色，賦予了此開一種富麗堂皇而吉祥之感，名符其實地成為乾隆的「瑞樹」。在此翻譯與定名的過程中，圖像在很多時候的確提供了標本所欠缺的補充性訊息，但同時也可能創造出現實所沒有的訊息。在滿文與漢文的對譯還沒有完全規範之時，翻譯上的困難同時也創造出許多選擇與詮釋的空間。在譯名的選擇上，我們可以看出，譯者在決定是否將滿文文本對應回某一漢文脈絡時，「吉兆」的意象確實在其判斷中占據了極為關鍵的位置。

吉兆意象的選擇顯然特別與滿洲根源的建構有關。前述乾隆皇帝的〈瑞樹歌〉提到此樹包含了八種樹葉，分別為「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而相應的標本與彩繪植物分部之冊頁上的標題，則分別為「本樹葉、密克特木葉、果松葉、樺皮葉、遮勒穆期葉、檜木葉、白榆葉、樺木葉」，名稱稍有不同。由於巴思哈奏摺中提到「其樹本如小葉楊樹」，對照上述清單，本樹葉應即白楊樹。但〈瑞樹歌〉所提到的「紫樺」、「白樺」與滿、漢奏摺中的「樺皮」（fiya）、「樺木」（šajilan），究竟如何對應？

¹⁰⁴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68，葉1上。

¹⁰⁵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7，頁213。

首先，滿文“fiya”及“šajilan”與漢文「樺皮」、「樺木」的對應，正如前述其他例子所示，要到乾隆三十六年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才確立。¹⁰⁶或者可以說，此次瑞樹調查相關物種的翻譯，很可能直接為《御製增訂清文鑑》所收錄，因為除了「遮勒穆期木」與「密克特木」這兩項直接以滿文音譯者沒有被收錄外，瑞樹所包含的其他樹種皆已被收錄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唯有“saksin”沒有採用「檜木」的翻譯，而是用了「杆松」。值得注意的是，“fiya”與“šajilan”早就為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御製清文鑑》所收錄。書中關於“fiya”的解釋如下：

fiya boco šanggiyan. abdaha ajige. erei notho be tolhon sembi.. weihiu kapi hunio i jergi tetun arambi.. fiyaringgiyaha xanggiyan ningge be šanggiyan alan kuringge be kuri alan sembi.. beri jergi hacingga agūra de nekeliyen erefi alambi.. fiyaringgiyahakū alahangge be. fulgiyan alan sembi geli calfa sembi..¹⁰⁷

樺皮樹 色白，葉小，其樹皮稱之為 tolhon（樺皮）。製作獨木船、裁縫箱、水桶等器具。攤開曬乾，¹⁰⁸〔色〕白者稱之為 šanggiyan alan（白樺皮），有花紋者稱之為 kuri alan（雜色樺皮）。薄薄地剝樺樹皮後包裹¹⁰⁹在弓等各種器具上。未攤開曬乾而貼者，稱之為 fulgiyan alan（紅樺樹皮），又稱之為 calfa。

¹⁰⁶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9，葉 32 上-下。

¹⁰⁷ 〔清〕清聖祖敕撰，《御製清文鑑》（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藏），卷 19，葉 24 下。

¹⁰⁸ 關於動詞 fiyaringgiyambi，《清文鑑》之解釋為：攤開固定後，用太陽曬乾，所以翻譯為攤開曬乾。參考日本東北大學的滿洲語辭典：<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manchu/list?groupId=11>（2021 年 5 月 20 日檢索）。請在線上字典輸入“fiyaringgiyambi”。

¹⁰⁹ 關於動詞 alambi，《增訂清文鑑》載 alan alambi 之漢字對應為「畫樺皮」，釋義則為：在弓等物品上貼上樺樹皮，取日本學者之翻譯為「包裹」。見〔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出自《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冊 82，卷 9，葉 48a-b。田村實造等編，《五體清文鑑識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頁 235。

根據上述，樺皮樹一般來說為白色，葉小。其外皮剝下後，可以貼在各種器具上，包括弓箭、獨木船等。但除了白色，也有雜色樹皮。如在《皇朝禮器圖式》中，就可以看到包裹樺皮的各種弓弩，包括「皇帝行圍哨箭」裹「紅樺皮」，¹¹⁰「梅鍼箭」裹「黑樺皮」，¹¹¹「槍頭箭」裹「白樺皮」，¹¹²「月牙鉞箭」裹「白樺皮」等。¹¹³可知樺皮有不同的顏色。因此，由樹皮顏色並無法判定「樺皮樹」究竟是乾隆御製詩中的「紫樺」還是「白樺」。

那麼，被翻譯成樺皮樹的“fiya”，究竟與被翻譯成樺木的“šajilan”有何差異？康熙《御製清文鑑》中關於“šajilan”的解釋如下：

šajilan cakūran de adali. notho i boco šahūn yali jun narhūn fisin.. niru sirdan i cikten jeseri bongko arambi. hafu buleku bithede. jeo gurun i u wang ni fonde. su xen gurun. šajilan i sirdan wehei selmin benjihe. golmin emu cy juwan ninggun urhun bihe shebi...¹¹⁴

樺木 同於檀木，樹皮色淺白，木質細密，製作大箭、箭矢的箭桿，水箭、兔兒叉箭矢前連接的木頭。《通鑑》云：周朝武王時，肅慎送楛矢石弩，長一尺十六半寸。

樺木，不同於樺皮。樺皮用於貼裹器具，樺木主要用於製作箭桿。此條解釋一開始即說“šajilan”與“cakūran”同，然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與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御製五體清文鑑》，“cakūran”所確立的翻譯卻是「檀木」，¹¹⁵則到底樺木與檀木的關係為何？在康熙朝《御製清文鑑》中，夾在“fiya”與“šajilan”之間的詞條，正是“cakūran”，釋義中提到此樹：「樹葉與樺皮樹（fiya moo）的樹葉一樣而粗

¹¹⁰ [清] 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14，葉25上-下。

¹¹¹ [清] 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卷14，葉32上-下。

¹¹² [清] 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卷14，葉35上-下。

¹¹³ [清] 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卷14，葉45上-下。

¹¹⁴ [清] 清聖祖敕撰，《御製清文鑑》，卷19，葉12上-下。

¹¹⁵ [清] 阿桂等奉敕撰，《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卷28，葉25上；[清] 清高宗敕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卷29，冊中，頁4039。

(abdaha fiya moo i abdaha i adali bime idun)」，樹皮重疊而生，¹¹⁶木質密實，主要也用於製作箭桿。康熙朝民間編寫的《大清全書》甚至將“cakūran”直接翻譯作「樺木」，¹¹⁷且書中的“šajilan”雖然拼法稍異，為“šajulan”，卻仍清楚地指出其乃「樺木可為箭桿者」。¹¹⁸因此我們可以說，康熙朝的宮廷與民間基本上都視“šajilan”與“cakūran”相同，或翻為樺木，或譯成檀木，重點是兩者都可用於做箭桿，且樹葉與樺皮木 (fiya) 一樣而粗。換句話說，“fiya”、“šajilan”、“cakūran”在康熙朝的翻譯雖然混亂，但是它們的葉形應該都是一樣的，而且我們也可以確定，“fiya”與“šajilan”分別用於指稱作為器具貼裏與製作箭桿的兩種材料。唯無法確定的是，此兩種材料是屬於同一樹種的不同部位？還是分屬不同物種？尤其樺皮尚有多種顏色的可能性，乾隆御製詩中的「紫樺」與「白樺」，究竟該如何與樺皮、樺木對應？紫樺與白樺果真是不同物種嗎？事實上，查遍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等古籍資料庫，除了乾隆御製〈瑞樹歌〉外，幾乎不見「紫樺」樹名，反而在諸多清代武備等器具的貼裏材料中，出現各種顏色的樺木皮。由此看來，乾隆詩中的紫樺與白樺，會不會只是不同顏色的樺皮木，而非不同物種？

回到冊頁中的標本與圖繪，不管是圖像或是標本，「樺皮葉」與「樺木葉」雖然在樹葉上大小有別，但是在長卵形的葉形與帶鋸齒狀的邊緣等特點上，沒有太大的差別。這也很符合上論樺皮葉與樺樹葉應該很類似的說法。¹¹⁹因此，〈瑞樹歌〉中的「紫樺」與「白樺」，或是冊頁中的「樺皮葉」與「樺木葉」，是否真的可以區分，又是否真的為兩種樹？確實很令人懷疑。此處的「紫樺」與「白樺」，原本或即無意對應「樺皮葉」與「樺木葉」，而是將兩種外觀上

¹¹⁶ [清] 清聖祖敕撰，《御製清文鑑》，卷 19，葉 12 上。

¹¹⁷ 沈啓亮，《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 261。

¹¹⁸ 沈啓亮，《大清全書》，頁 178。見日本東北大學「言語資料索引」：

<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kdic/listAction>（2021 年 5 月 20 日檢索）。

¹¹⁹ 在僅有樹葉的外形，而沒有樹形、花果、樹幹質感等資訊的情況下，王釗如何能將樺皮訂為碩樺 (*Betula costata*)，並將樺木訂為鵝耳櫪 (*Carpinus turczaninowii*) 呢？因為，如果僅觀看葉形與產地，則生長在東北區域的樺木屬下，還有諸多非常類似的物種，包括黑樺 (*Betula dahurica* Pall.)、堅樺 (*Betula chinensis* Maxim.) 等。

難以區分的標本，以顏色來區別、並以較不容易混淆的名稱分別命名，從而創造出異名同種的兩件標本；實際上，這兩種植物極可能本為同一物種。無論如何，可以合理推測，有關「瑞樹」曲折而混亂的命名原因，應該是為了刻意追求「八」這一數字。

為何要特別追求「八」這一數字呢？八分枝合體為一的千年大樹，究竟有何吉祥寓意？就中國的祥瑞傳統來說，不同木合生一株的「木連理」，在漢代就是很重要的祥瑞之一，著名漢代摩崖石刻〈西狹頌〉中的五瑞「黃龍、白鹿、木連理、甘露、嘉禾和承露人圖像，即有木連理，¹²⁰圖像上通常呈現兩株樹木相連或交纏在一起。根據唐代類書《藝文類聚》所引漢代〈瑞應圖〉：「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一本曰：不失小民心則生。」¹²¹木連理的出現，被視為有德君主出現的吉兆，可以將「八方合為一家」，亦即，乾隆皇帝詩中的八樹合一，很可能是「八方合為一家」的具體顯現，而此瑞樹應被視為如同「木連理」的瑞象。除此之外，此「八樣樹」是否與滿洲八旗的概念有關？這也很值得考慮。作為大清興起之地的盛京，其行宮迪光殿寶座上的匾額書「皇其序繼」，以強調帝王的天序，而寶座後方即選擇安置書有御製〈瑞樹歌〉的屏風。¹²²瀋陽皇宮作為後金入關前主要的皇宮，乾隆皇帝以象徵滿族根源與國體結構的千年主幹八種分枝之瑞樹，來框圍與定義此滿洲發源之寶座，應該是再恰當不過的。因此，此「八樣樹」合一的長白山瑞樹，同時是漢傳統下「八方合為一家」的瑞應，也是八旗合一的滿洲根本之象徵。

總之，在巴思哈赴長白山調查瑞樹時，乾隆皇帝儘管已經著手進行「新滿語」的建置，藉以將滿、漢詞語間的翻譯固定，但是，此際滿、漢詞語間的對應關係顯然還相當流動且混亂，而這樣的混亂正好創造出一種翻譯與命名的闕

¹²⁰ 關於「木連理」作為漢代常見的祥瑞現象，見 Lillian Lan-ying Tseng, *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chapter 2, pp. 125-127;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40.

¹²¹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88，卷 98，祥瑞部上，頁 948。

¹²² 關於此屏風的介紹，見李理，〈全屏巍峨高聳，帝王廂：側寫瀋陽故宮珍藏的清宮屏風（上）〉，《典藏古美術》，期 235（2012 年 4 月），頁 212。

態 (liminality)。在這無法決定的混沌闕態中，我們可以看到翻譯者（很可能是由軍機處所主導挑選）如何選擇漢文脈絡中具有古典瑞兆的名稱，或是刻意地以音譯創造出一個新名，以迴避漢文名稱可能帶有的負面意義，甚至利用同一種物種的不同名稱，以衍生出新增物種的假象，藉此創造出以「八」為總數的瑞象。在此翻譯與命名的過程中，圖像不僅作為連接兩種語文世界的重要媒介與根據，同時也提供標本所欠缺的訊息，包括顏色、生長樣態等，甚至創造出現實所沒有的訊息，以強化漢文翻譯選擇所營造出的祥瑞意象的穩定性。

七、先例：康熙皇帝的調查與《十八公圖卷》

乾隆調查長白山瑞樹的形式與意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規模康熙的先例而來。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編纂的《欽定滿洲源流考》，即幾乎全文刊登了康熙朝時派遣吳木訥等看驗長白山後所上呈的奏摺，¹²³其修辭與報告的方式可以說是巴思哈報告的前身，甚至很多的寫法與意象也能在乾隆〈瑞樹歌〉中看到迴響。兩篇奏摺的結構，都是先說明參與人員，然後按日期描述路程與交通工具等，而且敘事的高潮都出現在到達目的地後，標的物如何顯現與其引發的讚嘆。例如，吳木訥便提到，山中原本霧深難視，在跪宣聖旨後，即「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¹²⁴又云長白山頂如何「片片白光」、¹²⁵「香木叢生，黃花燦爛」等。¹²⁶讓人想起乾隆描述巴思哈所看到的瑞樹，乃「近樹無凡草，金光蔚敷披」，以及巴思哈本人自述對其「詳閱累日，驚喜歎異」等（附錄一、二）。總之，這兩次長白山調查的文本中，有許多類似的書寫與意象，特別是都在具體描述考察的過程時，將其所見到的自然景觀或現象極度地異象化。尤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時期《欽定滿洲源流考》的編者，特別

¹²³ [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下略），《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卷 14，葉 11 上-17 下。

¹²⁴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 14，葉 15 下。

¹²⁵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 14，葉 14 下。

¹²⁶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 14，葉 15 上。

在吳木訥的奏摺後，以小字加註：「案，自古言長白山者，皆得自傳聞想像之詞。我朝發祥基業，媲美幽岐。康熙年間吳木訥等奉旨親往看驗，所載尤為詳確。謹附錄於此」，¹²⁷強調以往對於長白山的瞭解，都是「傳聞想像之詞」，而康熙年間的吳木訥則是「奉旨親往看驗，尤為詳確」，這與乾隆御製詩中所言「是皆紀實非虛詞」，幾乎如出一轍。

東北作為很多不同部族的生活空間，坐落於此的長白山，並非為滿人所獨占。長白山之所以成為滿洲根源的象徵，乃是自康熙朝以來，歷經康、雍、乾三帝一連串的宣稱、儀式及文本生產等過程所努力建構而來的。歐立德即提到，此項由康熙所主導的長白山調查與其最後建置的祭山儀式，一方面係以建構其祖居地以定義什麼是「滿人」，另一方面則透過「祀典如五嶽」，將原來滿人的祖居地納入中國的範疇。如此一來，一旦滿人被認為祖居於中國內地，當然也就不是一個外來的政權。¹²⁸就滿洲文化的起源與自我認同之建構而言，康熙朝的調查與祭祀只是一個起點，到了乾隆朝，則更為全面且系統化地透過編撰〈御製盛京賦〉（1743）、《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1781）、《欽定滿洲源流考》（1783）等文本，將滿族傳統的部落神話與儀式體制化。¹²⁹除了承續康熙皇帝以實證調查挑戰中國傳統外，乾隆皇帝似乎更加重視重新與中國傳統建立連結，並尋求一種超越古今權威性的正統位置。除了現實調查所代表的「實」之外，乾隆皇帝亦十分重視其中所顯示的「史」的連結，「實」與「史」的兼顧，始終是乾隆皇帝所關切的重點之一。「八樣樹」合一的長白山瑞樹，若放在中國祥瑞的傳統來看，正如前述，很可能與「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的「木連理」瑞應有關。然而不可諱言的是，傳統「木連理」多是描繪兩樹相連，並不特別強調數字本身的指涉與象徵意涵，若要舉另一個更為直接的例子，應該是舊傳曹知白所繪之《十八公圖卷》。

¹²⁷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14，葉17上-下。

¹²⁸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pp. 603-646.

¹²⁹ 見 Pamela Kyle Crossley, "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4, pp. 761-790.

《十八公圖卷》現藏北京故宮（附圖 20），為清宮舊藏，上有「皇姐圖書」等元代大長公主收藏印，應為元人所作。畫中描繪一棵跟長白山瑞樹一樣的一本多幹奇松，乃馮子振所書〈十八公賦〉之補圖。根據《石渠寶笈》與安岐《墨緣彙觀》的著錄，¹³⁰畫後除了有馮子振書〈十八公賦〉外，¹³¹還有另外兩位常常參與公主雅集的文人鄧文原與趙巖的詩題，現三文皆已不存。由於松樹主幹部位有「曹知白畫」款署，因此著錄者皆以其為元代曹知白所作。然根據徐邦達考證，¹³²此款應為後添，故北京故宮現標以佚名。其佚失的馮子振書〈十八公賦〉前有一自序（附錄十一）。由此自序可知，此奇松生長於長城以北，從上京乘馬車數百里遠之地。該地東北數十里為古匈奴祭祀的樹林，而樹林四周都是砂石沙漠，松木因此高低偃倒，幾乎有千萬棵之多，即古代所謂的「八百里黑松林」。又經數十里，有一孤零零的驛站，旁有一棵松樹，長有十八幹，形態古偉，其枝幹大小小，參差而生。近年曾經遭人砍去兩幹，但伐砍之人旋即暴斃而亡。馮子振認為這是因為此樹長久以來受神物護持之故。馮子振因往赴應昌城而一再路過此松，並稱這樣一棵奇樹乃是天下、宇宙所未有。於是他請了一位方外盧生為之圖繪，自己也為其寫作一篇華麗的賦文。馮子振以瑰麗及豐富的各種歷史比喻來歌頌十八公的神奇，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將十八公視為唐太宗十八學士的化身，此十八學士「共瀛而登」，因而為「天地休徵」，¹³³透露出天下太平的吉祥徵兆。延續此一詮釋，鄧文原題詩中繼續以「耿耿瀛洲十八士」來指稱此一本十八幹的怪松，¹³⁴趙巖的題詩也以「別有

¹³⁰ 〈元曹知白十八公圖·一卷〉，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5，卷 44，葉 68 上-69 下；〔清〕安岐，《墨緣彙觀》，卷 3，39 上-41 上，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冊 10，頁 377-378。

¹³¹ 賦文見馮子振，〈十八公賦〉，收入〔元〕馮子振、李祁撰，王毅輯校，《海粟集輯存·雲陽集》（長沙：嶽麓書社，2009），頁 67-76。

¹³² 見徐邦達，〈十八公圖卷〉，收入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偽訛考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冊 3，頁 149-150。

¹³³ 見馮子振，〈十八公賦〉，收入〔元〕馮子振、李祁撰，王毅輯校，《海粟集輯存·雲陽集》，頁 68。

¹³⁴ 〈元曹知白十八公圖·一卷〉，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卷 44，葉 68 下。

棟梁材可用，昂霄聳壑見奇功」來指涉十八公所代表之國家棟樑顯現、屢建奇功的盛世。¹³⁵這件作品原為安岐舊藏，安岐在其《墨緣彙觀》載：「水墨作奇松一株，地坡數筆，其松一本十六幹」，¹³⁶並以為「回憶天地生物造化之妙如此」。¹³⁷此畫作後來進入清宮，登錄於《石渠寶笈》。值得注意的是，畫上書有「乾隆丁卯（1747）暮春（三月）之初」的乾隆御題，其言：

擢幹森霄漢，盤根育茯苓。淮南初得號，塞北早傳形。誰結三冬友，孤標萬古青。天風吹謖謖，擬構韻松亭。¹³⁸

乾隆皇帝歌頌此棵奇松聳入雲霄，其盤根錯結的根部孕育了珍貴的藥材茯苓，似乎也回應了馮子振的賦或是鄧文原與趙巖的題詩，將其視為孕育國家棟樑或人材的象徵。皇帝不僅在乾隆十二年寫了御題，並於福宮花園凝暉堂內另闢專室，將其與《元人君子林圖》及《元人梅花合卷》合度，名為「三友軒」，¹³⁹且命其重要詞臣董邦達與錢維城予以摹寫，足見其之重視。¹⁴⁰更重要的是，皇帝自己也在乾隆十五年的小春（農曆八月）親自摹寫了此畫（現藏於首都博物館），¹⁴¹並御題道：

問余底事是便宜，到處圖書得自隨。曹氏五緘傳粉本，漢家一樹引遐思。庚午小春月，撫曹知白十八公圖並題。¹⁴²

¹³⁵ 〈元曹知白十八公圖·一卷〉，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卷44，葉69上。

¹³⁶ 〔清〕安岐，《墨緣彙觀》，卷3，葉39上-下。

¹³⁷ 〔清〕安岐，《墨緣彙觀》，卷3，葉39下。

¹³⁸ 〈元曹知白十八公圖·一卷〉，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卷44，葉69上-下。

¹³⁹ 見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127-128。

¹⁴⁰ 〈錢維城摹曹知白十八公圖·一卷〉，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79，九洲清晏藏二，本朝臣工書畫，冊7，頁3839；〈董邦達仿曹知白十八公圖·一軸〉，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22，養心殿藏七，本朝臣工書畫二，冊3，頁1223。

¹⁴¹ 薛永年、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35，頁238-239。

¹⁴² 〈御筆仿元人十八公圖·一卷〉，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76，西苑等處藏，瀛臺一，皇上御筆書畫，冊7，頁3633。

值得注意的是，相傳曹知白《十八公圖卷》中所描繪的奇松主幹所生分枝，彼此緊鄰、甚至重疊，實際上難以計算具體分枝數量，安岐應該是根據馮子振序中所言，此樹曾被砍去兩枝，而認定畫中所繪為「一本十六幹」。但是不管在董邦達、錢維城、或是乾隆皇帝本人的摹本中，《石渠寶笈續編》中都記載其為「水墨畫松，一株十八幹」，¹⁴³而且，細審御筆《十八公圖卷》，也的確清楚地畫出十八分枝。顯然乾隆皇帝非常重視「十八」的完整性，畢竟擁有十八幹於一株，實為孕育十八學士盛世之徵兆。因此，乾隆皇帝不僅為之御題，且闢室度藏。就時間點來說，由乾隆十二年三月的御題可知，乾隆早在此時就已注意到描繪一本多幹奇松的《十八公圖卷》，及至三年後，派巴思哈前往長白山調查的標的物，一樣是一本多幹的滿洲「八樣樹」。我們知道巴思哈完成任務後回到寧古塔，於當年的七月去世，卻不清楚巴思哈整份調查報告什麼時候才交到乾隆皇帝手中？只知道巴思哈死時正逢萬壽節，一直要到八月萬壽節結束後，其死訊才正式上達天聽。而乾隆皇帝摹寫《十八公圖卷》之時，正是巴思哈死訊上報之際，也極可能是乾隆皇帝實際接獲其調查報告的時間。合理的推測應是，傳為曹知白所繪的《十八公圖卷》，很可能早在乾隆十二年便啓發乾隆皇帝，遂派人前往調查集八種樹於一幹的瑞樹。

長白山「八樣樹」所呈現出的異象，無論從「木連理」文化傳統，或《十八公圖卷》的圖像脈絡來看，都是中國傳統祥瑞政治中，聖王在位、賢才雲集的瑞兆。有趣的是，調查滿洲瑞樹後，乾隆對漢傳統瑞樹的《十八公圖卷》進行了摹寫，並於摹本的御題中特別提到「漢家一樹引遐思」，讓人想起乾隆在稍後〈瑞樹歌〉中所提及的「大椿徒傳八千歲，較此奚啻父視兒」詩句，刻意比較滿洲瑞樹與漢傳說中的大椿瑞樹，認為長白山瑞樹比起漢大椿，無異是父親跟兒子之別。換句話說，乾隆皇帝在相傳曹知白《十八公圖卷》的啓發下，特地命人前去調查滿洲的八樣樹，而在得到調查結果後，將長白山的八樣樹建構成象徵滿洲盛世的瑞樹，隨即著手摹寫曹知白《十八公圖卷》，將其定義為

¹⁴³ 〈御筆仿元人十八公圖·一卷〉，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 76，西苑等處藏，瀛臺一，皇上御筆書畫，冊 7，頁 3633。

「漢家一樹」，並以「引遐思」這樣模稜兩可的詞彙，隱約指涉其作為漢文化瑞兆的意涵。相較於乾隆皇帝派人實地調查所獲得的「紀實徵祥」，曹知白《十八公圖卷》所呈現的瑞兆，自然僅只止於「引遐思」的層次。在此，乾隆皇帝似乎再一次證明，滿洲傳統的祥瑞象徵，要比漢傳統來得更為有據且確實。

八、圖像、調查與祥瑞政治

長白山的瑞樹不僅關涉滿洲文化根源，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有意將這株滿族傳說中的異樹納入漢人祥瑞傳統中，並與之競衡。他不僅宣稱瑞樹樹齡超越漢傳統記載的大椿樹，更透過實地調查以證明其真實性，此樹作為聖王瑞徵，其存在比起中國傳統任何瑞應記載都還要確實可信。這樣的推論，可以由乾隆〈瑞樹歌〉的改版中得到進一步的證明。乾隆的〈瑞樹歌〉，目前可見有兩個版本，一為收入《四庫全書》的《御製詩二集》中的〈瑞樹歌〉，另一則為抄錄在三件《瑞樹圖》中的版本。根據《四庫全書提要》，此《御製詩集》（包括初集、二集、三集）皆校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因此諸《瑞樹圖》上的版本應該都早於《御製詩集》（附錄十二）。《瑞樹圖》的版本（以下稱《瑞樹圖》版）與御製詩的版本（以下稱《御製詩集》版）間，雖然僅有稍微的更動，但是似乎透露出將瑞樹從一種神仙式的存在，轉換到漢傳統中關於「天」的論述格套的轉換。例如，《御製詩集》版的第一句，就將《瑞樹圖》版稱長白山為「天都」，改為乃「天所作」，然後將瑞樹生長地，從「神仙區」改為具體地理位置的「鄰嵎峽」。所謂「嵎峽」，根據《書經》〈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之描述，為中國東方的邊地，¹⁴⁴古時亦稱朝鮮為「嵎峽」，¹⁴⁵凡此皆與長白山的地理位置頗為相符。除此之外，《瑞樹圖》版在強調神木的古老時，表示就連神農氏對其都無以名之。然而在《御製詩集》版中，

¹⁴⁴ 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冊4，頁291。

¹⁴⁵ 《禹貢錐指》：「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范《史》以東夷九種為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見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冊4，頁291。

則將其年代推到更早，視其為天地生成之際所誕生的「兩儀神秀」。我們不知道此詩是在什麼時候修訂的，但可以確定的是，瀋陽盛京行宮迪光寶座後圍屏所刻寫的即是新的版本，也就是《御製詩集》版。總之，雖然長白山「瑞樹」在經過了調查、圖像繪製與初版〈瑞樹歌〉的寫作後，在乾隆十七年就已成立，然而，〈瑞樹歌〉的後續修訂卻非常細微，主要反應在用典以凸顯中國傳統統治論述中的祥瑞與天道相應之政治學。

倘若將《瑞樹圖》圖像製作放在此一祥瑞傳統中來觀察，便能發現乾隆皇帝顯然承襲雍正皇帝「以圖為據」的祥瑞操作手法，¹⁴⁶甚至還更進一步，主動積極調查與發掘自己的祥瑞，並以具體的數據配合實物，為其存在之真實性進行極為客觀的陳述。尤其在描繪個別物種的樹葉局部冊頁中，作畫者余省在空白的背景中，以一種近乎西洋水彩之沒骨畫法描繪各種樹葉與毬果，不僅色墨的暈染與植物向背的光影息息相關，不似惲壽平一路較為純粹地以暈染展現顏色的細微變化（附圖 21），反而更接近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植物學圖繪中，以水彩淡彩描繪、帶有自然主義的新式風格，較為輕鬆、不顯僵硬（附圖 22）。尤其圖像與標本並置的方式，也讓人聯想到英國的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於 1687 至 1689 年赴牙買加（Jamaica）期間所收集的標本冊（附圖 23），¹⁴⁷後來出版為著名的《牙買加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¹⁴⁸或是十八世紀下半葉，西班牙傳教士穆蒂斯（José Celestino Mutis, 1732-1808）從南美洲新格拉納達（New Granada）送給林奈的標本（附圖 24），皆為其親自採集之物種等。¹⁴⁹這些特色的並置出現，都讓我們看到

¹⁴⁶ 見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頁 38-40。

¹⁴⁷ 圖版出自 Tony Rice, *Voyages of Discovery: A Visual Celebration of Ten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History Expeditions*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2000), p. 25.

¹⁴⁸ Sir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Madera, Barbados, Nieves, S. Christophers and Jamaica: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rbs and Trees, Four-footed Beasts, Fishes, Birds, Insects, Reptiles, &c. of the Last of Those Islands* (London :Printed by B.M. for the author,1707-1725), two volumes.

¹⁴⁹ 圖版出自 Daniela Bleichmar, *Visible Empire: Botanical Expeditions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 p. 44.

乾隆朝《瑞樹圖冊》的形式與風格，很可能跟同時期歐洲植物學的發展密切相關。¹⁵⁰

九、結 論

本文從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派遣乾清門二等侍衛巴思哈前往長白山調查一棵「八樣樹」出發，結合各式圖像、奏摺、御製詩與檔案資料，試圖還原此瑞樹從調查、命名、命題、繪製、標本收集，到最後裝裱成冊的完整過程。原本是傳說中生長在滿洲長白山具多枝樣貌的「八樣樹」，在乾隆皇帝延續祖父康熙皇帝對長白山調查模式的基礎上，經由派遣貼身侍衛巴思哈與擅長西法的宮廷畫家王幼學進行勘查與記錄，並於調查結束後，透過御製詩的撰寫與仔細斟酌物種名稱的翻譯，成功轉換為在漢傳統中具有吉祥寓意的「瑞樹」。

值得注意的是，這棵瑞樹不僅被納入中國祥瑞傳統的系譜中，乾隆更以其前所未有的調查手段與擬真圖像的運用，強調此罕見祥瑞的「可視性」與「實體性」，使其「真確性」超越古今。長白山瑞樹的西法圖繪與實地調查，表面上看似受到傳教士所帶來的歐洲影響，然而若置於十八世紀考據學興盛的政治脈絡中，毫不意外地，在「求其是」的同時，也伴隨著對「求其古」的詰問。換句話說，「現實的真實」僅是祥瑞政治的面向之一，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面向，則是與過去傳統的連接與對話。透過沿用元代曹知白《十八公圖卷》的祥瑞格

¹⁵⁰ 關於清宮與歐洲植物及植物學發展的交流，見 Jane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imited, 2007), pp. 64-65; Emily Byrne Curtis 著，劉祐竹翻譯，〈耶穌會士湯執中：乾隆皇帝宮廷裡的玻璃工匠與植物學家〉，《故宮文物月刊》，期 353（2012 年 8 月），頁 38-45；王廉明，〈北京耶穌會北堂和中國植物圖像：十八世紀中西園藝學交流的一則軼事〉，《紫禁城》，2018 年第 10 期，頁 62-73；Lianming Wang, “The Last Gift from Beijing: Jesuit Botanists and the European Quest for Chinese Plants,” *Sulla Via del Catai*, 13:22 (May 2020), Special Issue “Flora e giardini: influssi e suggestioni nei secoli tra Cina e Occidente,” edited by Maurizio Paolillo, pp. 126-155；王廉明，〈北京耶穌會北堂花園綜考：起源、功能及其隱喻〉，《輔仁歷史學報》，期 36（2016 年 3 月），頁 197-244；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絡在清宮〉，《數位文化電子報》，期 21（2015 年 3 月）；張湘雯，〈海西集卉：清宮園囿中的外洋植物〉，《故宮文物月刊》，期 396（2016 年 3 月），頁 104-119 等。

套，並在全圖中並置西法與文人傳統風格，《瑞樹圖冊》圖像遂成爲一個虛擬真實的重要平臺，同時回應並兼容「求其古」與「求其真」兩種理想。

在此背景下，雖然與歐洲傳統密切相關的擬真風格與自然調查的手段，未必不具政治性修辭，也未必在本質上更爲中性或客觀，但它們在形式上，的確能提供更多現實界的訊息——包括物種的質感、比例、顏色等——從而更有效地在現實層面上，鋪陳中國古老政治修辭的重要理想。而這一理想爲何？無疑正是關於滿人根源如何被建構爲「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的永生瑞兆。

附錄一 王幼學畫《瑞樹圖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余省畫《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所題乾隆御製〈瑞樹歌〉

長白之山，是曰天都。隆崇案衍神仙區，眾水之源會其極。中產萬木，雖有神農，不能指名呼。萬木傑池鬱爭長，問年皆在循蜚疏侏時以上。厥有瑞樹為之伯，如星拱北群所仰。久聞瑞樹心識之，命圖以來真神奇。畢歆河本鴨綠支，船不能進易威呼。溯流而上，乃至西埭墨勒溪，威呼又不能進。捨舟陸行一由旬，斯見瑞樹臨厓。近樹無凡草，金光蔚敷披。聳身三丈五尺餘，七分去二其合圍。上分十有二十大枝，莖葉輪囷各異姿。其種有八若列眉，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自頂至根，合十餘丈崢參差。靈芝九本三秀滋，是皆紀實非虛詞。乃信神壤天所祕，未許塵世尋常窺。大椿徒傳八千歲，較此溪童父視兒。特一瑞樹，真足凌駕前古史所垂。宜乎長白之山，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¹⁵¹

附錄二 二等侍衛巴思哈所上之奏摺（滿、漢兩體抄錄）

乾清門二等侍衛 臣 巴思哈謹

奏。臣 奉

命察看畢歆河瑞樹，謹率同繪院待詔王幼學，取道寧古塔，至三姓地方，經駐劄副都統富僧阿，遣熟諳路徑之驍騎校向齊、披甲遮赫呼、閒散希呼犒為前導，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九人隨行。由松花江，泛舟過烏蘇哩江，抵畢歆河河口。樹木蒙密，水勢湍迅，船不能進，易威呼小船溯流而上，至西埭墨勒溪口，小船又不能進，登岸步行三十餘里，乃見瑞樹一本，生於溪岸。其樹本如小葉楊樹，而質直理堅。自根至杪，約十丈餘。隨縛梯上下，規度樹身，圍抱二丈五尺，挺幹三丈五尺。其上分十二大枝，枝上又出二十餘小枝，莖葉各異。有若果松者、若檜木、樺木者，有若密克特木、遮勒穆期木者，有若白榆、樺皮者，合大幹共八種。果松、檜二種，莖大如椀，樺木等木，或如臂如指，最細者如箸，方生發芽者，更不可數計。統觀全樹四周，東南最繁盛稠密，種類交錯，不能悉辨。西北二面，羅列可數。又有靈芝九本，環附樹身而生。臣詳閱累日，驚喜歎異。謹按樹形，詳繪為圖，並擇取各種莖葉，附摺恭呈 御覽。再臣等所過山川形勝，如寧古塔西南八十里之阿補淀，淀內之石梁，正西百里之德哩安平石，船廠東南二百里之

¹⁵¹ 〈王幼學瑞樹圖·一軸〉，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43，御書房藏八，本朝臣工書畫四，冊4，頁2244-2245。

拉法峯，城東十里之祈雨潭，繪圖五幅。及船廠所屬地方，按輿地圖，繪圖一幅。並捕得異雀八種，皆京師所未見者，謹繪圖一幅，一併進呈。伏祈 睿鑒，謹奏。奉旨：著余省設色，並各種樹葉，裝潢成冊呈覽。欽此。¹⁵²

Kiyan cing men i jai jergi hiya amban Basha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amban bi hese be dahame, bihin bira i bade banjiha sabingga moo be tuwanara de, gingguleme nirugan nirure ba i bukdari icihiyakū wang io hiyo be gaifi ningguta ci ilan hala de isinafi, tubai tehe meiren i janggin, fusengga, jugūn sara funde bošokū hiyangci, uksin jehere, sula hirkoo be tucibufi gajarci obume, bašokū ilan, uksin orin uyun niyalma be dahame yabubume, jaha tefi sunggari ula deri usuri ula be wesime, bihin bira i angga de isinafi, bujan šuwa luku fisin, mukei arbun haksan turgen, jaha yabuci oJORAKū ofi, halame weiHU tefi wesihun yabume sirmel birgan i angga de isinafi, weiHU geli yabuci oJORAKū ofi, dalan de tafafi gūsin ba funceme yafagalame yabuha manggi, birgan dalan de banjiha emu sabingga moo be sabuha, tuwaci moo i da amida moo i adali, banjihangge tondo fili akdun fulehe ci dube de isitala, golmin ici juwan juda funceme bi, tukda hūwaitafi dergi fejergi be mayalame tuwaci, moo i muwa ici juwe juda sunja jušuru, sihin i den ici ilan juda sunja jušuru, terei ninggude juwan juwe amba gargan fakcafi, gargan i ninggude geli orin funceme ajige gargan banjiha, cikten abdaha meni meni encu holdon, saksin, šajilan, mikde, jelemki, hailan, fiya, amba cikten be dabume uheri jakūn hacin, erei dorgi holdon moo, saksin moo juwe hacin muwa ici moro i gese bi, šajilan i jergi moo, muwa ici mayan i gese simhun i gese, umesi narhūn ningge sabka i gesengge bi, teni arsukangge toloho seme wajirakū, moo i gubci duin dere be šurdeme tuwaci, dergi julergi ergi gargan abdaha fik seme luku, hacingga moo hiyaganjame banjifi getuken i ilgaburakū, wargi amargi ergi iledu sabumbime, geli sabingga sence uyun moo i šurdeme banjihabi, amban be ududu inenggi kimcime tuwafi, kiyakiyame ferguweme wajirakū, gingguleme moo i arbun be tuwame, narhūšame nirugan nirufi, geli hacingga moo i gargan abdaha be fatame gaifi, bukdari i sasa gingguleme tuwabume wesimbuhe, jai amban meni duleme yabuha alin bira arbungga ba i dorgi, ningguta i wargi julergi jakūnju ba i dubede bisire abu bilten, bilten i fakū, ningguta i tob wargi tanggū ba i dubede bisire derin i necin wehe, girin ulai dergi julergi juwe tanggū ba i dubede bisire lafa hada, girin ula hoton i dergi juwan ba i dubede bisire aga baime wecere juce be sunja afaha nirugan niruha, jai girin ulai harangga ba be, ba na i nirugan be tuwame, emu afaha nirugan niruha, jai gemun hecen de sabuhakū jakūn hacin i ferguwecuke cecike be butafi gingguleme

¹⁵² 除《瑞樹圖冊》所錄漢文奏摺，也可見於，〈余省瑞樹圖·二冊〉，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 35，重華宮藏十二，本朝臣工書畫四，冊 4，頁 1850。

nirugan nirufi suwaliyame ibebuhe, bairengge, ejen genggiyen i bulekuše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Ioi sing de afabufi nirugan nirufi, hacingga moo i abdaha be suwaliyame abdangga afaha obume dobtolome weilefi tuwabume wesimbu sehe.¹⁵³

附錄三 〈為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畫匠前往寧古塔等地照例乘驛前往事〉，《軍機處檔》，滿文上諭，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18-009-000008-0003-0035。

hese wasimbuhanngge kiyang cing men i hiya basha be tucibufi nirure faksi be gaifi ningguta i jergi bede[bade] nirugan nirubume unggimbi esede kooli songkoi giyamun morin yalubogini[yalubukini] sehe erebe coohai jurgan, booi amban yamun hiyai bade afabu seme dorgi bithesi futai de afabuha. salingga araha mingšan acabuha.

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上諭：遣派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領畫匠前往寧古塔等地繪畫；此等人員照例乘驛。欽此。將此交中書福泰，諭令兵部、內務府總管衙門、侍衛處。薩林阿繕寫，明善校對。

附錄四 〈軍機處奏揀派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帶領畫匠赴吉林繪製奇樹片〉，《軍機處檔》，滿文錄副奏片，無年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95-3520-011。

hesei kiyang cing men i hiya basha be, girin ulai harangga bade bisire emu moo de jakūn hacin i banjija moo be nirubume unggire de tucibuhebi, ede gemun hecen ci giyamulame genefi, moo banjija bade isibume, amasi Julesi udu inenggi yabure, jai mooi nirugan nirure jergi baita de uheri udu inenggi baibure babe basha de fonjici, alarangge, gemun hecen ci giyamun deri ningguta de isinarangge, olhon jugūn ilan minggan ba, ningguta ci casi mukei jugūn deri hūrha ula be wasime ilan hala, usuri ulai angga jergi babe yabume bihin birai sekiyen moo banjija bade isibume, ilan minggan ba hamimbi, amasi Julesi yabure mooi nirugan be nirure, jai ningguta ci derin i babe nirufi amasi isinjirengge, murušeme bodoci uheri emu tanggū susai inenggi šurdeme baibumbi seme alambi, uttu ofi, basha be hūdun dasatabufi, nirure faksi be gaifi, ere biyai orin ci dosi giyamun yalubufi jurambufi unnggiki, basha sabe giyamulame unggire babe hese arafi suwaliyame gingguleme tuwabume ibebuhe.

¹⁵³ 見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余省畫《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欽命派遣乾清門侍衛巴思哈將吉林烏拉所屬地方一樹生長八種樹木繪圖。是故詢問巴司思哈：巴思哈自京城馳驛前往，至樹木生長之處，往返行走幾日，又，繪畫等事共需幾日情形。據稱，自京城經驛站抵寧古塔旱路三千里，自寧古塔行經水路下虎爾哈河，行經三姓、烏蘇里江口等地，至比興河源樹木生長之處，近三千里。返往行走將樹木繪圖，又描繪從寧古塔至德哩地方後返回，粗估共需一百五十日左右等語。為此欲令巴思哈盡速整備，領畫匠，自本月二十日起，馳驛啟程進入。將巴思哈等馳送情形，繕旨一併敬謹進呈御覽。

附錄五 〈寧古塔將軍新柱為侍衛巴思哈等將赴烏蘇里江苾馨河給奇樹圖請為其備辦船隻事呈文〉，《軍機處檔》，滿文咨呈，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一具奏，具奏人：御前侍衛鎮守寧古塔等地將軍（吉林將軍）騎都尉一次記錄新柱（Sinju）、鎮國將軍副都統（吉林副都統）記錄八次宗室松阿哩（Sungari），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2-0683-001。

alibume unggire bithe.

ninggut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sei bithe, coohai nashūn i ambasa de alibume unggihe, alibume boolara jalīn, coohai nashūn i baci unggihe bithede, ningguta i jergi bade moo nirugan nirubume takūraha, jai jergi hiya basha i alahangge, basha bi, nirume bahanara bošokū i da wang io hiyo i emgi ningguta i jergi bade nirugan nirume genere de, hesei gemu giyamun šangnahabi, baicaci gemun hecen ci ningguta de isibume, ere sidende giyamun bisire be dahame, tookanjara hacin akū, ningguta ci casi usuri bihin i bira de isibume giyamun akū bime geli mukei jugūn, aika doigonde yabubufi belheburakū oci, nerginde isinaha manggi, tookanjara be boljoci ojurakū, bairengge harangga jiyanggiyūn de yabubufi, meni baibuci acara jaha weihu, baitalara jaka hacin be belhebureci tulgiyen, jai bihin bira i dorgi emu moo ci jakūn hacin i moo banjire moo bisire babe sara bošokū dashū, uksin candai, candai i ecike uksin kalji, jai neneme bihin birai dorgi de tehe kiyakar halai ursei dorgi sara urse be sonjome tucibureo seme baime alambi, uttu be dahame gemun hecen ci ningguta de isitala giyamun bisire bade oci, gisurebure ba akū, giyamun akū bade oci, ceni baitalara de isingga be bodome jaha weihu be belhebukini, baitalara jaka hacin be inu acara be tuwame belhebufi, basha sei isinafi uthai jurambume mutere tookabure de isiburakū obukini, jai jaha weihu be šurure de inu niyalma baibure be dahame, ini alaha emu moo de jakūn hacin i moo banjira babe sara udu niyalma be uthai jaha weihu be šurure niyalmai oronde tucibufi unggikini seme ilan biyai orin de [isinjihai] ningguta meiren i janggin de hiya basha ningguta de isinafi ilan halai baru mukei

jugūn i deri genere de baibure jaha, beneme genere coohai urse be doigonde belhebume sonjome tucibufi, ilan hala de[isibume benebukini] seme yabubuhaci tulgiyen, ilan halai meiren i janggan de hiya basha i joriha candai, dashū, kalji sebe uthai tomilame tucibufi belhebume, kemuni neneme bihin birai dorgide tehe kiyakar halai urse i dorgi jaha weihi de urehe yabume dulembuhe, moo be takara fe urse be sonjome tucibufi, jaha weihi tesure be bodome doigonde icihiyafi, jugūn i unduri jetere jaka hacin eiten baitalara agūra tetun be gemu giyan fiyan i obume belhebukini seme yabubuhaci tulgiyen, meni baci belheme icihiyaha babe giyan i coohai nashūn i bade alibume boolaci acambi, erei jalin gocika hiya ninggut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baitalabure hafan emu jergi ejehe sinju, gurun be dalire janggan bime meiren i janggan jakūn jergi ejehe uksun i sunggari alibme unggihe.

abkai wehiyehe i tofohoci aniya dui biyai ice.

咨呈

鎮守寧古塔將軍等文咨呈軍機處大臣，為呈報事，准軍機處咨開：據差往寧古塔等處繪畫樹木之二等侍衛巴思哈呈詳：職巴思哈率同能繪圖之領催王幼學前去寧古塔等處繪圖，經奉旨皆賞給馳驛。查得自京城至寧古塔之間有驛站，並無阻滯之處，然自寧古塔以外至烏蘇里畢歆河，則無驛站，且又係水路，若不預為咨行備辦，臨時抵達，恐有阻滯，亦未可料。相應咨請該將軍，將職等應需之威呼獨木小船（jaha weihi）、需用物料先行預備外，再知曉畢歆河內一樹生有八木之樹所在位置之領催達斯虎（Dashū）、披甲燦代（Candai）及燦代之叔父披甲喀爾濟（Kalji），又先前居住在畢歆河地方之恰喀爾氏（Kiyakar hala）等眾人中，亦請挑選遣往等語。是故，自京城抵寧古塔，有驛站處，無庸議論；無驛站之處，著籌足夠彼等所求之數，備妥刀船、獨木舟。所用物件，亦視情況備辦，巴思哈等抵達後即能起行，不致遲誤。再撐駕威呼獨木小船亦需用人，伊所告稱，知道一樹生長八種樹木地方之若干人，即派遣充作行駛刀船、威呼獨木船之員缺等語。於三月二十日〔一到達〕即咨行寧古塔副都統，侍衛巴思哈抵寧古塔，由水路前往三姓地方，需用獨木小船，帶往前去兵丁等，預行選派〔送往〕三姓地方外。咨行三姓副都統，將侍衛巴思哈所指定之燦代、達斯虎、喀爾濟等即行調派預備，仍將先前居住在畢歆河地方內的恰喀爾氏眾人內，揀派熟練撐駕威呼獨木船、認識樹木之舊眾人，籌足估算威呼船隻足夠之數預先辦理、沿途吃食物品，一應需用器械，俱妥為預備外，吾等備辦情形，理應呈報軍機處。為此，御前侍衛鎮守寧古塔等地將軍（吉林將軍）、騎都尉一次記錄新柱（Sinju）、鎮國將軍副都統（吉林副都統）記錄八次，宗室松阿哩（Sunggari）呈報。

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附錄六 〈署理寧古塔將軍印務吉林副都統松阿哩為報欽派二等侍衛巴思哈於寧古塔病故情形事咨呈〉，《軍機處檔》，滿文咨呈，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具奏，具奏人：署理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印務鎮國將軍兼副都統紀錄六次宗室松阿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1-0275-014。

alibume unggire bithe.

ninggut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sei bithe coohai nashūn i bade alibume unggihe alibume bithe yabubure jalin, ningguta i meiren i janggin irentai i boolaha bade, hesei takūraha jai jergi hiya basha nimeme nadan biyai ice juwe de, ningguta de isinjifi, uthai funde bošokū narsai be tucibufi saikan eršeme, mini beye ton akū tuwaname meni ubai oktosi be, okto omibume dasabuci umai sain oJORakū ofi, jiyanggiyūn yamun de alban i oktosi be ganabume yabubuha amala nimeku cun cun i nonggibume ofi, lafa de bisire [ini ahūn] i jui mukden be jasime gajifi narsai i emgi eršebumbihe, nadan biyai juwan jakūn de, alban i oktosi se isinjifi, okto omibume dasacibe, kemuni yebe ojoro be serebuhekū, ineku biyai orin ilan de, nimeme ujelefi, honin erinde akū oho, eiten baitalara etuku, jibehun, sishe, hobo i jergi jaka be, gūsai da asari sebe tucibufi tuwame weilebufi, mini beye tuwame icihiyaha seme nadan biyai gūsin de boolame isinjiha be, meni baci uthai ningguta i meiren i janggin de amasi bithe unggifi, nimeme akū oho hiya basha i giran be, giyan fiyan i icihiyabufi jugūn yabuci ojoro be tuwame, giyamun bahabufi, giran be, girin i ula de isibume benjibufi, ubaci ini banjiha deote juse de afabufi, dahame jihe kutule sei sasa saikan [tuwašatabume]gemun hecen de isibume benebuki [ne hiya] basha i nimeme akū oho babe [giyan i] donjibume wesimbuci acambihe, damu enduringge ejen i tumen se eldeke biya ofi wesimbuci banjinarakū, sirame biyade, jai gingguleme donjibume wesimbureci tulgiyen, neneme turgun be tucibume alibume boolaha, erei jalin ninggut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i doron be daiselame icihiyara, doron be dalire janggin bime meiren i janggin ninggun jergi ejehe uksun i sunggari alibume unggihe.

abkai wehiyehe tofohoci aniya jakūn biyai ice.

咨呈

鎮守寧古塔等地將軍等文咨呈軍機處，為呈行文事。據寧古塔副都統伊楞泰 (Irentai) 呈稱：欽差二等侍衛巴思哈患病，於七月初二日抵達寧古塔，即差驍騎校那爾薩 (Narsai) 妥為照料，職不時親往探視，雖經本處醫生開藥調治，並未好轉，相應咨請將軍衙門醫官後，因病勢漸漸加重，寄信喚來在拉發 (Lafa) 之巴思哈兄之子穆克敦 (Mukden)，與那爾薩共同照料。七月十八日醫官等抵達，

經服藥調治，仍不見痊愈。本月二十三日病情加重，於未時病故。所有需用衣服、被褥、棺柩等項，差委協領阿薩里（Asari）等監製，職親為相度酌辦等情，於七月三十日呈報前來；本處即咨回寧古塔副都統，應將已病故之侍衛巴思哈尸骸妥為辦理，視道路可行情形，由驛送至吉林烏拉，尸骸交彼處伊胞弟及子，同隨行之跟役等，妥為照料，送至京城。今侍衛巴思哈病故之處，理應奏聞，惟恭逢皇上萬壽之月，不便具奏，俟來月再行敬謹奏聞外，應將前情緣由，聲明呈報。據此，署理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印務，鎮國將軍兼副都統、紀錄六次宗室松阿哩（Sunggari）咨呈。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一日

附錄七 〈署理寧古塔將軍印務吉林副都統松阿哩奏請欽派二等侍衛巴思哈於寧古塔病故，伊母請將其葬在祖墳地摺〉，《軍機處檔》，滿文奏摺，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具奏人：松阿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3-0171-0275-017。

吉林烏拉副都統松阿哩
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具奏
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發批
九月二十二日 松阿哩 存

wesimburengge

aha sunggari 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re jalin. ere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ilan de, ningguta i meiren i janggin irentai i boolaha bade, hesei takūraha jai jergi hiya basha, usuri ci amasi jidere de, jugūn de nimeme, nadan biyai ice juwe de ningguta de isinjifi, oktosi be gajifi, okto omibume dasabuci, umai sain ojarahū, cun cun i nimeme ujelehebi seme boolame isinjime, aha bi uthai nirui janggin ging de be takūrafi, aha meni yamun i alban i oktosi be gamame, geli hiya basha i nimeku aika dulerakū gese oci, eiten baitalara jaka hacin be, giyan fiyan i icihiyafi belhekini seme afabufi unggihe, ging de se juwan jakūn de, ningguta de isinafi okto omibume dasabuci dulekekū, orin ilan de akū oho, eiten baitalara jaka hacin be, meiren i janggin irentai gūsai da asari sebe tucibufi belhebui, ini beye tuwame icihiyafi giran de kooli songkoi giyamun i sejen bahabufi benjime, jakūn biyai ice duin de, girin i ula de isinjiha manggi, basha i giran be gemun hecen i baru benebuki serede, basha i eniye i baime alibhangge, buya anggasi mini jui basha, orho suiha i gese dubei jergi aha,

enduringge ejen i ujen kesi be alifi, heni majige hūsun bume mutehekū, aldasi beye akū oho, anggasi mini eigen i mafa ama i eifu, girin i ula de bimbime, mini juse omosi gemu girin i ulai bade tehebi, te mini jui basha i giran be giyamun deri gemun hecen de isibume benebucibe, damu gemun hecen de bisire mini urun se umesi asigan, omolo huhuri, mukūn hala akū de, kemuni boigon be suwaliyame amasi guribume gajire be dahame, bairengge, mini jui basha i giran be werifi, mini eigen i mafa, ama i eifu kūwaran de acabume sindabureo seme alibuhabi, hiya basha i giran be, ini eniye i baima alibuha songkoi icihiyabuci ogoro ojorakū babe, aha mi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abkai wehiyehe i tofoho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de fulgiyan fi i pilehe hese, ai ojorakū sere babi, ere be inu hese baire de isinarangge, yargiyan i hūlhi ten de isinahabi sehe.

abkai wehiyehe i tofoho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ninggun.

奏

奴才松阿哩謹奏：為請旨事。本年七月十三日，據寧古塔副都統伊楞泰（Irentai）呈報，欽差二等侍衛巴思哈自烏蘇里回來路上患病，於七月初二日抵寧古塔後，延醫服藥調治，並不好轉，病情漸漸加重等情前來。奴才即差委佐領京德（Gingde）帶領本衙門醫官，又交待若侍衛巴思哈病情看似不能痊愈，所有需用物品，著妥為預辦。京德等於十八日抵達寧古塔，雖經服藥，仍調治無效，已於二十三日病故。所有需用物品，副都統伊楞泰飭委協領阿薩里等預備，親為辦理，尸骸照例給驛站車輛運送，八月初四日業經到達吉林烏拉；欲將巴思哈尸骸送往京城時，據巴思哈母親呈稱：卑孀婦兒子巴思哈本係微末粗鄙奴才，蒙皇上之洪恩，未能効涓埃之力，半途身故。孀婦先夫之父祖墳塋在吉林烏拉，且我的子孫皆居住在吉林烏拉，現今我子巴思哈之尸骸，雖由驛送往京城，但我在京城的媳婦很年輕，孫子在吃奶，因無宗族，還是要將家產一併遷回，請留下我兒子巴思哈尸骸，合葬於先夫之父祖墳塋等情前來。侍衛巴思哈之尸骸，可否准照伊母所請辦理之處，奴才不敢擅便。為此，謹奏請旨。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奉硃批諭旨：有何不可之處，亦至於將此請旨，實屬糊塗之至。欽此。

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錄八 〈巴思哈奏聞往茲馨河地方為一怪樹繪圖之情形摺〉，《軍機處檔》，漢文奏摺，具奏人：巴思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2-0683-010。

奏為欽遵
諭旨繪聲河地方所生一本數種枝葉之樹敬謹繪
圖呈
御覽事 才 巴思哈帶領王 聖由寧古塔水路至三
地方徑三站地方副都統富僧阿冰 此處樹
皆屬地方之驍騎校齊披甲塔和勒開散
希爾考並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九人由松花江順
流溯烏雅江至茲馨河口河流湍急林木蒼
翠 樹葉青碧行匪淺也
只感慮不能行控舟步行三十餘里 西爾墨爾漢
崖旁之樹領催而齊等 樹葉青碧
等 樹葉青碧
尺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火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輪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嘉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有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共 高三丈五尺至七尺 樹葉青碧

種 統 餘 樺 木 等 類 如 茶 既 或 如 臂 花 等
指 助 又 有 始 生 者 此 八 種 葉 逐 種 採 取 分 別 收
貯 樹 西 面 白 刺 洋 細 看 視 東 南 二 面 枝 葉 交 錯
各 種 不 能 分 辨 一 西 北 二 面 甚 厚 葉 面 又 生 木 靈 芝 九
本 奴 才 不 勝 駭 異 備 極 謹 自 北 南 視 所 看 樹 形 繪 圖
一 幅 自 西 向 東 所 看 樹 形 繪 圖 一 幅 並 未 去 一 葉 茶 葉
御 覽 外 奴 才 又 將 沿 途 經 山 川 形 勝 留 心 繪 畫 景 色
塔 西 南 今 德 里 所 有 之 阿 布 達 達 內 之 石 梁 宇 古
塔 五 百 里 所 有 之 德 林 石 井 吉 林 烏 拉 東 南 二 百 里
所 有 之 拉 法 必 宜 吉 林 烏 拉 城 東 十 餘 里 之 祈 雨 潭
並 山 兵 備 圖 五 副 用 捕 得 京 師 所 無 之 烏 雀 八 種
即 不 能 繪 圖 今 德 國 一 副 刺 取 雀 皮 八 張 每 雀
等 行 書 林 鳥 在 所 屬 地 方 照 地 里 圖 備 圖 二 幅
已 思 對 在 三 堆 堆 才 排 六 月 十 九 日 起 程 申 請 奉 旨
痛 至 月 初 十 日 抵 寧 古 塔 傷 寒 重 積 身 體 甚 軟 未 能
不 期 行 達 德 國 與 指 來 手 謝 聖 敬 謹 具
奏

附錄九 不同文獻的不同物種名稱及可能的現代命名（作者整理）

現代物種辨認（王釗）	髭脈槭	碩樺	臭冷杉	紅松	鵝耳櫪	白樺	花楸	大青楊
《御製詩集》	遮勒穆期	紫樺？	檜	松	白樺？	白榆	密克特木	白楊
余省王幼學畫《瑞樹圖冊》	遮勒穆期木葉	樺皮葉	檜木葉	果松葉	樺木	白榆葉	密克特木葉	本木葉 小葉楊樹
	jelemki	fīya	saksin	holdon	šajilan	hailan	mikde	da moo i abdaha amida
余省畫《瑞樹圖冊》	遮勒穆期木葉	樺皮葉	檜木葉	果松葉	樺木葉	白榆葉	密克特木葉	本木葉
	jelemki	fīya	saksin	holdon	šajilan	hailan	mikde	da moo i abdaha amida
乾隆三十六年《御製增訂清文鑑》		fīya 樺皮樹 卷 29， 32 下	saksin 杆松 卷 29， 22 下	holdon 果松 卷 29， 21 上	šajilan 樺木 卷 29， 32 上	hailan 榆 卷 29， 28 下		amida 小葉楊 卷 29， 30 上

附錄十 瑞樹圖中植物名稱與現代中文名、學名之對照參考表¹⁵⁴

序号	画中植物名称	植物现代中文名	植物学名
1	遮勒穆期木叶	髭脉槭	<i>Acer barbinerve</i>
2	桦皮叶	硕桦	<i>Betula costata</i>
3	桧木叶	臭冷杉	<i>Abies nephrolepis</i>
4	果松叶	红松	<i>Pinus koraiensis</i>
5	桦木叶	鹅耳枥	<i>Carpinus turczaninowii</i>
6	白榆叶	白桦	<i>Betula platyphylla</i>
7	密克特木叶	花楸	<i>Sorbus pohuashanensis</i>
8	本树叶	大青杨	<i>Populus ussuriensis</i>

附錄十一 《十八公圖卷》中佚失的馮子振書〈十八公賦〉自序

長城之北又數百里，馳上京東北百數十里為蹕林，環林四向，皆斥磧沙嶂，松低昂掩冉，殆且千萬而未有數，所為古「八百里松林」者也。又數十里為孤驛，松一根十八幹，共挺挺植立，項領撐轟，勢各合抱，不令參差高下，大小不齊，少分媿色於其間，氣岸磅礴，大似老人大父行。下視蒼岡翠麓，或偃或怪，各端倪嚴事，無敢抗行。東西行者，例以十八公尊稱之。莫有能口講指畫，使人悠然意會者，心每悵然。頃年，十八幹之二幹戕於操斧入林之夫，其人旋斃，則神物之呵護，由來久矣。今十六幹巍然昂霄，其二幹斧癢，亦自小小突兀。大德壬寅把萸後三日，予道應昌，始一再過之，歎其倔奇瑰傑，有如此者。無論南北萬里，殆九州之表，六合之外，自有宇宙以來，未之有也。其還薊京也，語方外客盧生曰：「吾行諸方四十年，所見五大夫之魁梧魄礪何算，未見十八公之真面目如此，公之真為十八公者，生其為我圖之。」生欣然為貌其韻度，悉緣吾言如此。其驛亭沙塞，荒寒寥落之狀，種種甚似。觀是圖者，便應仿佛敕勒川泉蘭下，當亦慨然重太息於予之慕遠遊而廣《離騷》也。遂為之賦。¹⁵⁵

¹⁵⁴ 王釗，〈觀乎動植：康乾時代的清宮博物繪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8），表 2-1，頁 65。

¹⁵⁵ 〔清〕安岐，《墨緣彙觀》，卷 3，39 下-40 下，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10，頁 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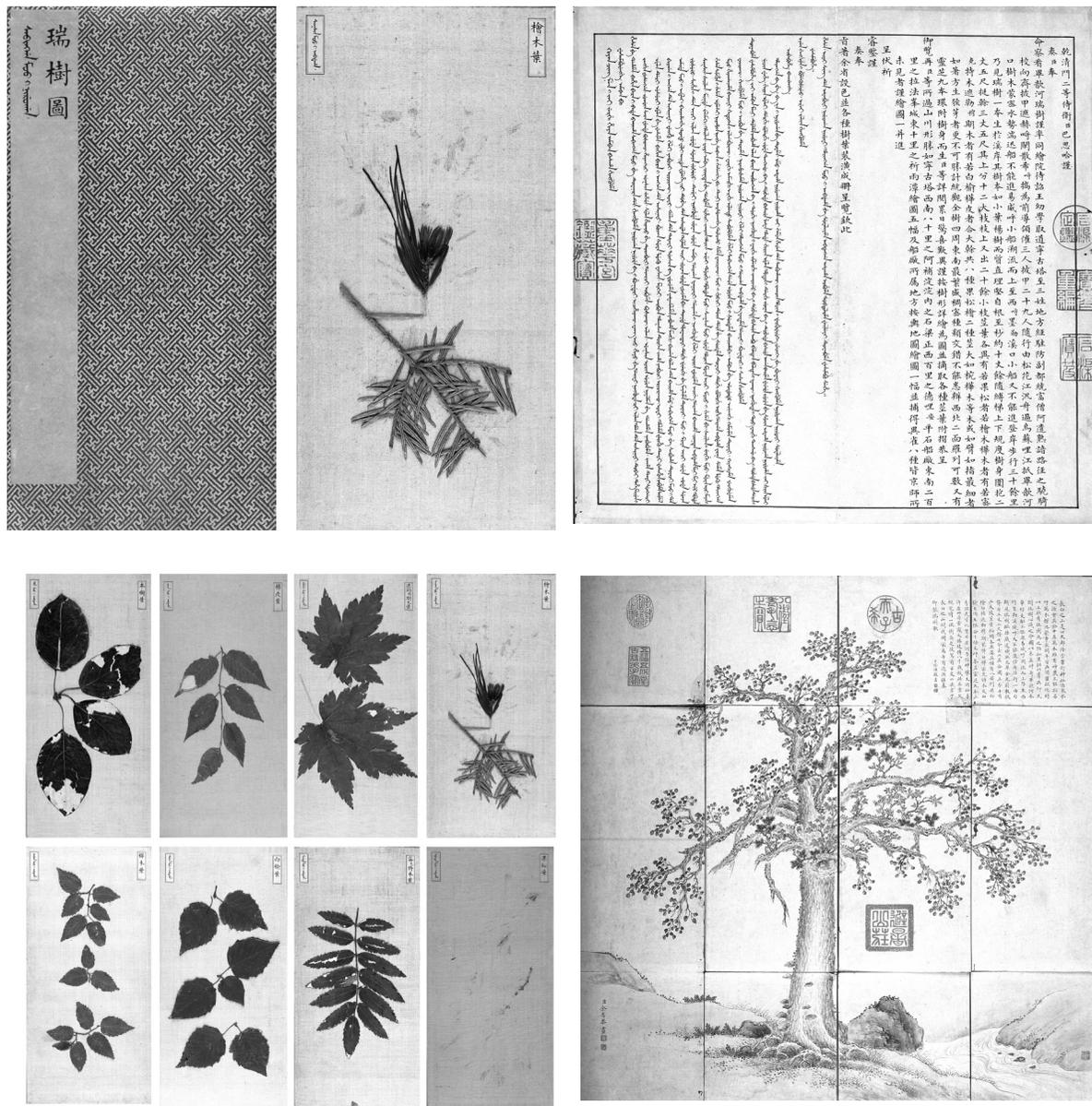
附錄十二 畫作上的御製詩與《御製詩集》版本比較

長白之山，是曰天都（長白之山天所作）。隆崇案衍神仙區（隆崇案衍隣嶠峽），眾水之源會其極。中產萬木，雖有神農，不能指名呼（中產萬木，兩儀神秀鍾於茲）。萬木傑池鬱爭長，問年皆在循蜚疏仡時以上。厥有瑞樹為之伯，如星拱北群所仰（如星拱北，群所瞻仰棲靈祇）。久聞瑞樹心識之（此句無），命圖以來真神奇。畢歆河本鴨綠支，船不能進易威呼。溯流而上，乃至西埽墨勒溪，威呼又不能進，捨舟陸行一由旬。斯見瑞樹臨屢屢，近樹無凡草，金光蔚敷披。聳身三丈五尺餘，（叶）七分去二其合圍，上分十有二十大枝，莖葉輪囷各異姿。其種有八若列眉，松、檜、白楊、遮勒穆期、紫樺、白樺、密克特木、白榆。（叶）自頂至根合十餘丈崢參差，靈芝九本三秀滋。是皆紀實非虛詞，乃信神壤天所祕，未許塵世尋常窺。大椿徒傳八千歲，較此奚啻父視兒。特一瑞樹，真足凌駕前古史所垂，宜乎長白之山，開我國家萬年有道無疆基。¹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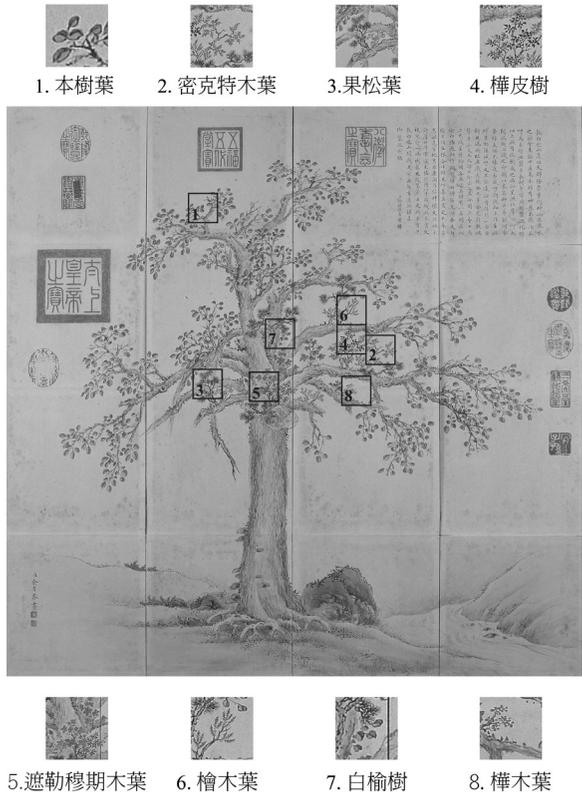
¹⁵⁶ 〈王幼學瑞樹圖·一軸〉，見〔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卷 43，御書房藏八，本朝臣工書畫四，冊 4，頁 2244；〔清〕清高宗，〈瑞樹歌〉，《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卷 31，葉 2 下-3 下。文本以《瑞樹圖》上的版本為主，括號內則為《御製詩集》所更動之處。



附圖2 [清] 余省、王幼學，《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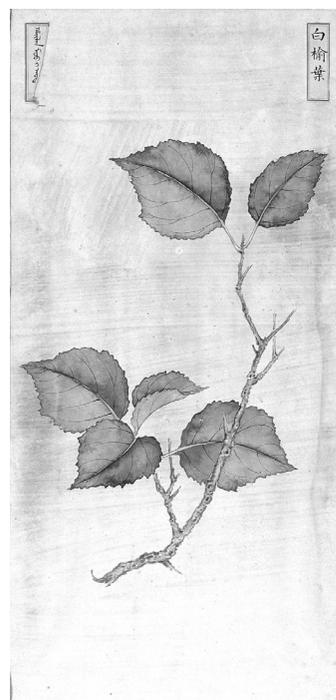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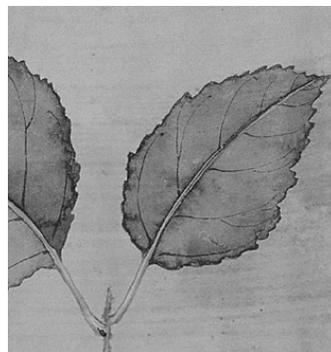


附圖3 [清]余省，《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5 《瑞樹圖冊》之瑞樹部位標示圖。
 [清]余省、王幼學，《瑞樹圖冊》，冊1，
 第1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上)果松、檜松、樺木、密特克木、遮勒
 穆期木、白榆、樺皮，與作為主幹的小葉楊
 樹，八種樹共生一株標示圖。
 (右)十二巨支標示圖。





附圖6

(左上、下)〔清〕余省，〈檀羅結〉，《海西集繪冊》，175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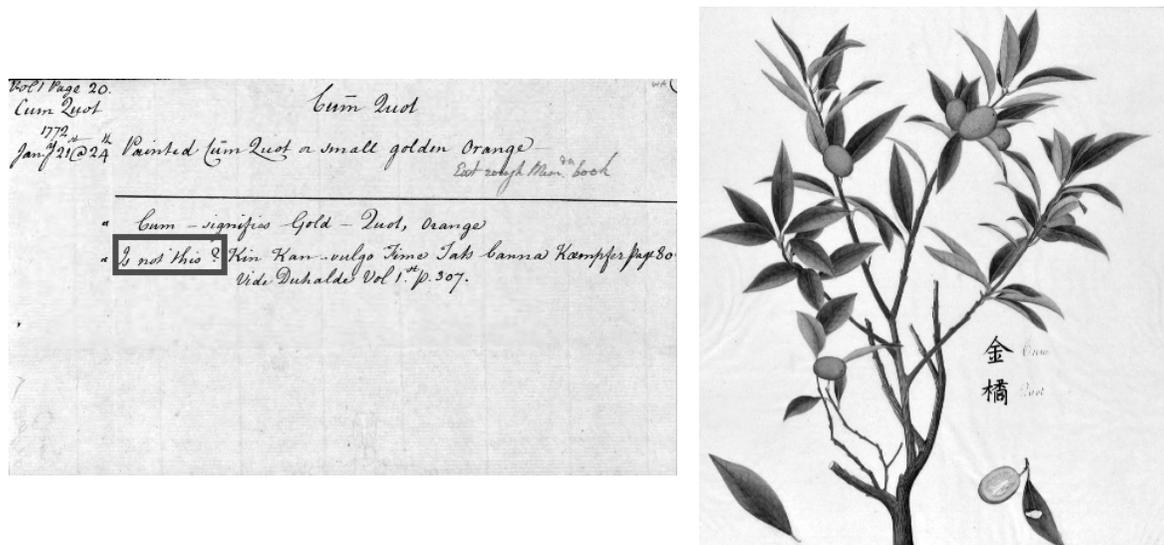
(右上、下)〔清〕余省、王幼學，〈白榆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7

(左上、下)〔清〕余省，〈芸香枝〉，《嘉產薦馨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上、下)〔清〕余省、王幼學，〈本樹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8

- (左) Descriptions and Index to Volume 1, John Bradby Blake Archive,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 pdf., p. 36.
- (右) Drawings of Chinese plants and fish by native artis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ohn Bradby Blake (circa 1744-1773), vol. 1, 1770-1774, M-152, John Bradby Blake Archive,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 pdf., p. 23.



附圖9 (從左到右)

- 9-1 杉松 (*Abies holophylla*)，拍攝地：北京市海澱區中科院北京植物所，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http://ppbc.iplant.cn/tu/5090178> (2021年5月31日檢索)。
- 9-2 杉松 (*Abies holophylla*) 標本，採集地：東三省，引自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標本館：<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c74cfbd6> (2021年5月31日檢索)。
- 9-3 [清] 余省、王幼學，〈檜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9-4 [清] 余省，〈檜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10

(左) 臭冷杉 (*Abies nephrolepis*)，拍攝地：北京市海澱區中科院北，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ppbc.iplant.cn/tu/1366509> (2021年5月31日檢索)。

(右) 臭冷杉 (*Abies nephrolepis*)，採集地：中國吉林省，引自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
<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ecadd136> (2021年5月31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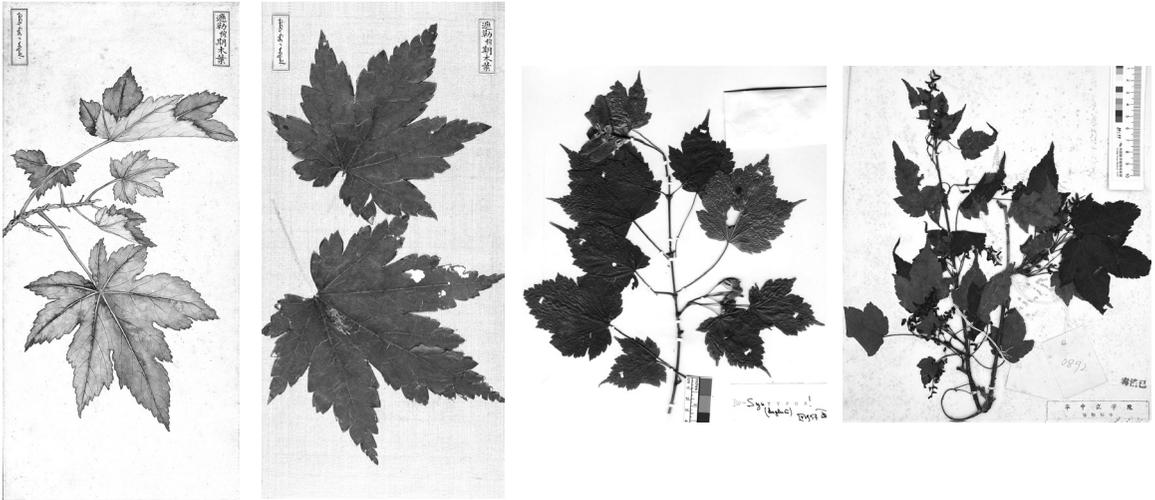
附圖11 (從左到右)

11-1 杉松 (*Abies holophylla*)，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http://ppbc.iplant.cn/tu/169839> (2021年5月31日檢索)。

11-2 杉松 (*Abies holophylla*)，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http://ppbc.iplant.cn/tu/169838> (2021年5月31日檢索)。

11-3 臭冷杉 (*Abies nephrolepis*)，拍攝地：吉林省白山錦江大峽谷，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ppbc.iplant.cn/tu/356542> (2021年5月31日檢索)。

11-4 臭冷杉 (*Abies nephrolepis*)，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http://ppbc.iplant.cn/tu/169855> (2021年5月31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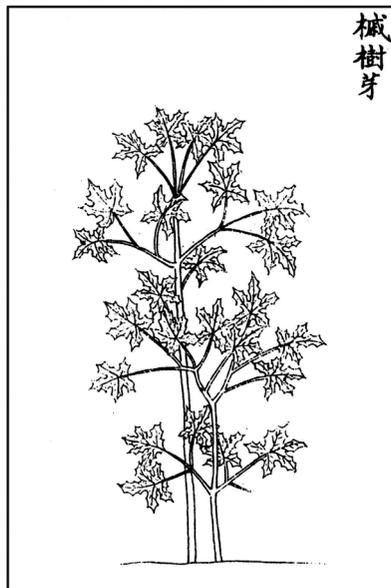
附圖15 (從左到右)

- 15-1 [清] 余省、王幼學,〈遮勒穆期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15-2 [清] 余省,〈遮勒穆期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15-3 髭脈槭 (*Acer barbinerve*) 標本,採集地: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引自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
<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075963b1> (2021年5月31日檢索)。
- 15-4 小楷槭 (*Acer komarovii*) 標本,採集地:中國湖北省,引自華中農業大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
<https://www.cvh.ac.cn/spms/detail.php?id=f35d4dbf> (2021年5月31日檢索)。



附圖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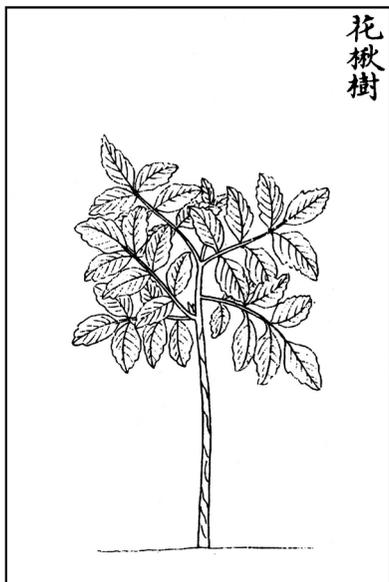
- (左) 髭脈槭 (*Acer barbinerve*), 拍攝地: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ppbc.iplant.cn/tu/442282> (2021年5月31日檢索)。
- (右) 小楷槭 (*Acer komarovii*), 拍攝地:吉林省白山市撫松縣,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ppbc.iplant.cn/tu/7242500> (2021年5月31日檢索)。



附圖17

(左)〔清〕余省、王幼學，〈遮勒穆期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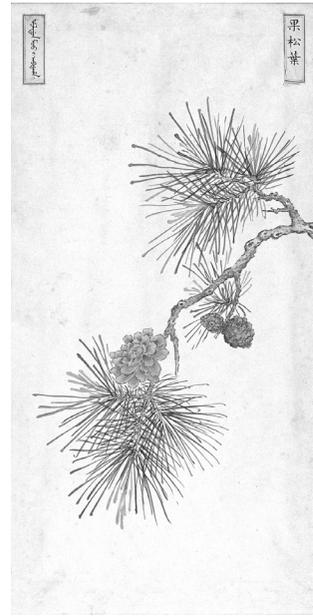
(右)〈槭樹芽〉，見〔明〕朱橚撰，《救荒本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0，卷5，葉21下。



附圖18

(左)〈花椒樹〉，見〔明〕朱橚撰，《救荒本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0，卷5，葉31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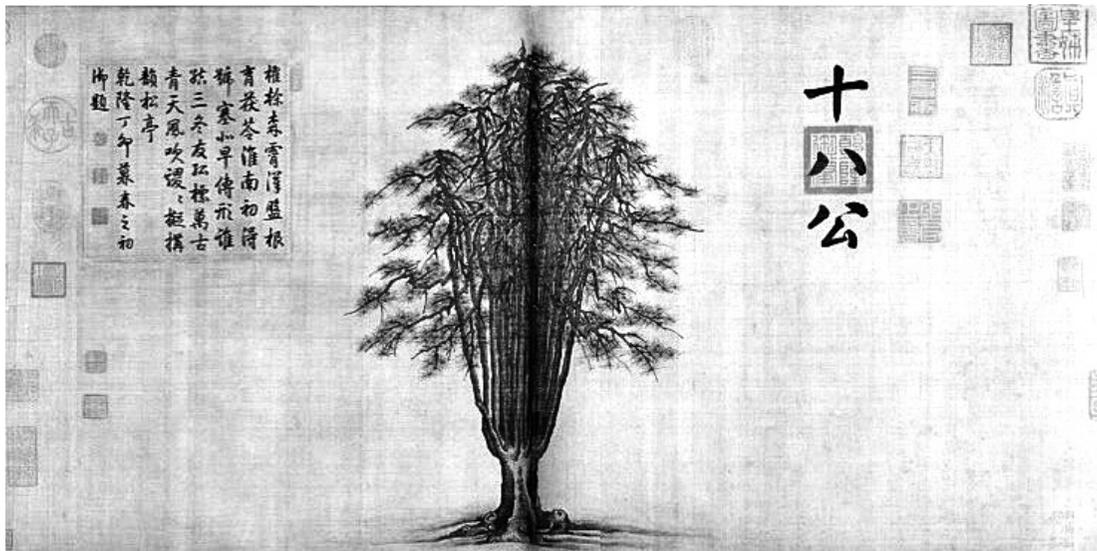
(右)〔清〕余省、王幼學，〈密克特木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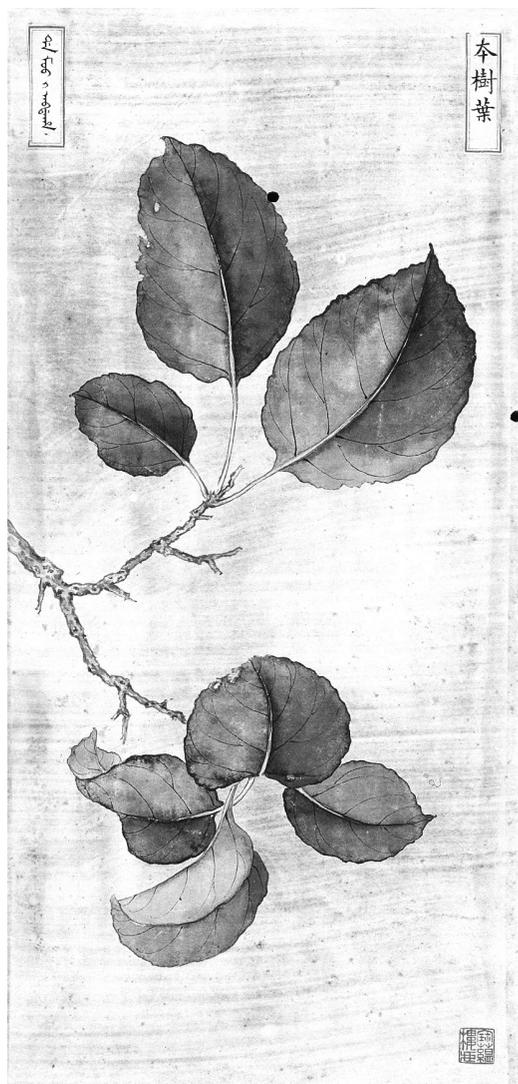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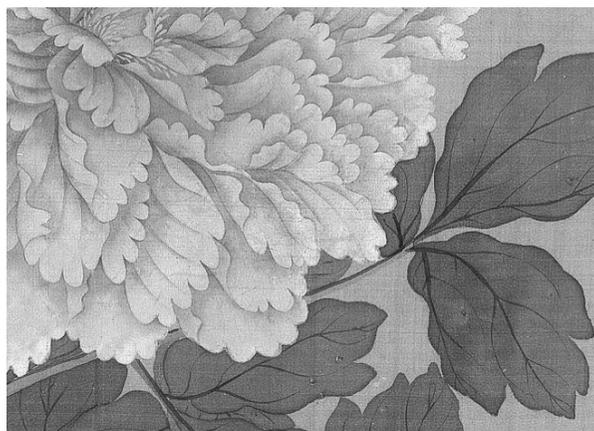
附圖19

(左) 紅松 (*Pinus koraiensis*)，拍攝地：北京市海澱區北京市植物園，引自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ppbc.iplant.cn/tu/5052222> (2021年5月31日檢索)。

(右) [清] 余省、王幼學，〈果松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20 傳 [元] 曹知白，《十八公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21

(左)〔清〕恽壽平，《牡丹冊》，168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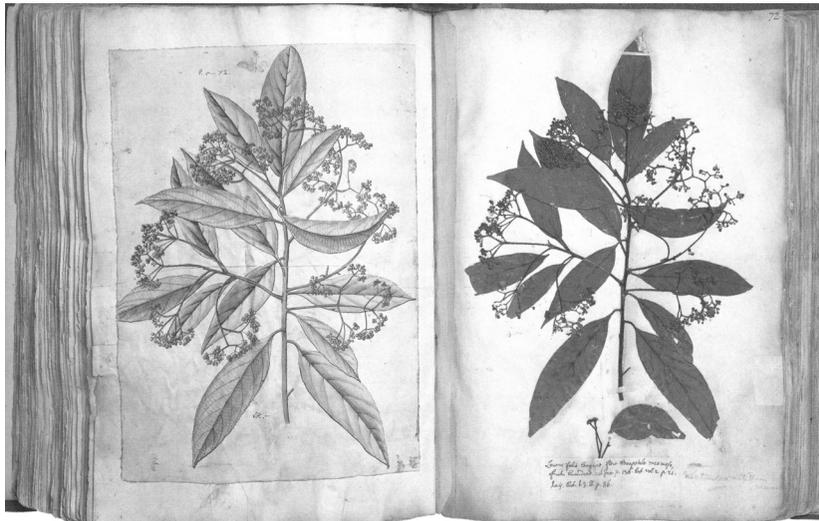
(右)〔清〕余省、王幼學，《本樹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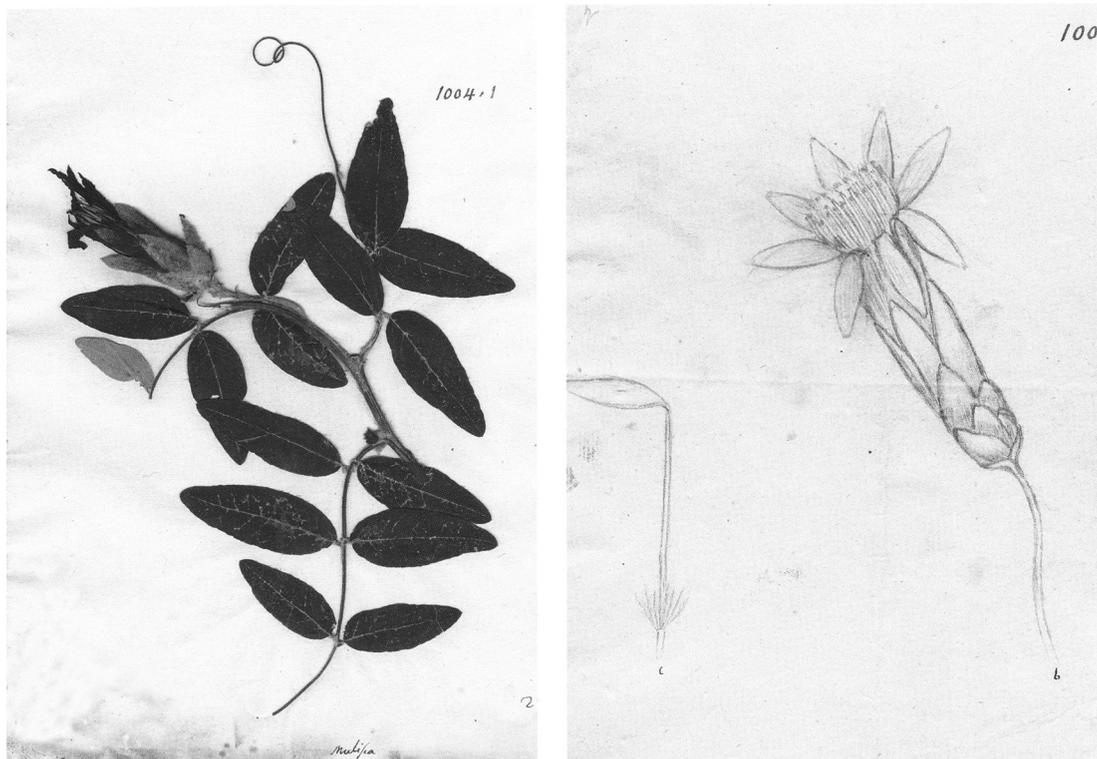
附圖22

(左) [清] 余省、王幼學，〈樺皮葉〉，《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 William King (British, active mid to late 18th century), *Granadilla Foliis Trilobatis*, 1763, watercolor on vellum,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 <https://www.huntington.org/verso/2018/08/love-flowers>.



附圖23 Sir Hans Sloane, Jamaica herbarium of pressed specimens and illustration, a leather-bound volume, 1687-1689,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引自 Tony Rice, *Voyages of Discovery: A Visual Celebration of Ten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History Expeditions*, p. 25.



附圖24 穆蒂斯 (José Celestino Mutis) 從新格拉納達 (New Granada) 送給林奈 (Carl Linnean) 的標本與其鉛筆素描，引自 Daniela Bleichmar, *Visible Empire: Botanical Expeditions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 fig. 2.2, fig. 2.3, p. 44.

徵引書目

一、文獻、檔案

- 《軍機處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0171-0275-014、03-0171-0275-017、03-0172-0683-001、03-0172-0683-010、03-0195-3520-011、03-18-009-000008-0003-003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唐〕釋辯機撰，釋玄奘譯，《大唐西域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羅願撰，石雲孫點校，《爾雅翼》，合肥：黃山書社，1991。
- 〔元〕馮子振、李祁撰，王毅輯校，《海粟集輯存·雲陽集》，長沙：嶽麓書社，2009。
- 〔明〕朱橚撰，《救荒本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30。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2、774。
- 〔清〕允祿、蔣溥等纂，《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時期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0。
- 〔清〕王幼學，《瑞樹圖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冊 4，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安岐，《墨緣彙觀》，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冊 10，1996。
- 〔清〕余省，〈芸香枝〉，《嘉產薦馨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余省，〈檀羅結〉，《海西集繪冊》，175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余省，《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清〕余省、王幼學，《瑞樹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清〕汪灝、張逸少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7。
- 〔清〕阿桂、董誥編，《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
- 〔清〕阿桂等奉敕撰，《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
-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收入中國書畫研究社編，《畫史叢書》，冊 3，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 〔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5。
- 〔清〕清高宗，〈余省仿宣和三思圖〉，《御製詩集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3。
- 〔清〕清高宗，〈神樹賦〉，收入《御製文初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 〔清〕清高宗，〈瑞樹歌〉，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 〔清〕清高宗敕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 〔清〕清聖祖敕撰，《御製清文鑑》，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藏。
- 〔清〕清聖祖御定，張英、王士禛、王揆等編纂，《御定淵鑑類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93。
- 〔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4。
-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3。
-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冊 82，臺北：世界書局，1986。
-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乾隆九年武英殿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清〕和珅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馬齊、張廷玉等奉敕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冊 2、5，臺北：華文書局，1969。

二、專著

- 《爾雅》，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46，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 7，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編，《住宅建築模數協調標準》，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
- 王叔岷，《莊子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 田村實造等編，《五體清文鑑識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
- 祁美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 常江、李理，《清宮侍衛》，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 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冊 1、4、7，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
- 薛永年、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冊 35，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

- Bataki, Yota, Sarah Burke Cahalan, and Anatole Tchikine. *The Botany of Empi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 Bleichmar, Daniela. *Visible Empire: Botanical Expeditions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Cambridge :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2007.
- Kim, Seonmin.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 O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Hung, Wu.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ilpatrick, Jane.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imited, 2007.
- Pavord, Anna. *The Naming of Names: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5.
- Rice, Tony. *Voyages of Discovery: A Visual Celebration of Ten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History Expeditions*.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2000.
- Rogaski, Ruth. *Knowing Manchuria: Environments, the Senses, and Natural Knowledge on an Asian Borderl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 Schlesinger, Johathan.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Schiebinger, Londa.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chiebinger, Londa and Claudia Swan, eds.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 Sloane, Sir Hans.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Madera, Barbados, Nieves, S. Christophers and Jamaica: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rbs and Trees, Four-footed Beasts, Fishes, Birds, Insects, Reptiles, &c. of the Last of Those Islands*. London: Printed by B.M. for the author, 1707-1725, two volumes.
- Tseng, Lillian Lan-ying. *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 Whiteman, Stephen. “Kangxi’s Auspicious Empire: Rhetorics of Geographic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Qing.” In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ham, edited by Yongtao Du and Jeffrey Kyong-McClain.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三、論文及專文

王釗，〈觀乎動植：康乾時代的清宮博物繪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8。

- 王廉明，〈北京耶穌會北堂和中國植物圖像：十八世紀中西園藝學交流的一則軼事〉，《紫禁城》，2018 年第 10 期，頁 62-73。
- 王廉明，〈北京耶穌會北堂花園綜考：起源、功能及其隱喻〉，《輔仁歷史學報》，期 36，2016 年 3 月，頁 197-244。
- 佟永功、關嘉祿，〈乾隆朝「欽定新清語」探析〉，《滿族研究》，1995 年 2 期，頁 66-70。
- 李理，〈全屏巍峨高聳，帝王廂：側寫瀋陽故宮珍藏的清宮屏風（上）〉，《典藏古美術》，期 235，2012 年 4 月，頁 214-219。
- 李滉，〈藝術的科學，科學的藝術：清代宮廷畫譜〉，《紫禁城》，2004 年第 2 期，頁 87-103。
- 柳澤明，〈故宮博物院藏滿漢合璧《鳥譜》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期 3，2004 年 7 月，頁 18-39。
- 徐邦達，〈十八公圖卷〉，收於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偽訛考辨》，冊 3，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 劉曉東，〈康熙朝「三道溝事件」的處置與對馬倭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5 期，頁 57-65。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一），《滿語研究》，1993 年第 2 期，頁 79-84、55。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二），《滿語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68-77、50。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三），《滿語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51-58。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四），《滿語研究》，1996 年第 2 期，頁 31-38。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五），《滿語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37-44、59。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六），《滿語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32-43。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七），《滿語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26-33。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八），《滿語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83-88。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九），《滿語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33-40。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十），《滿語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66-76。

- 張虹、程大鯤譯編、佟永功審訂，〈乾隆朝「欽定新清語」〉（十一），《滿語研究》，2005年第1期，頁41-48。
- 張湘雯，〈海西集卉：清宮園囿中的外洋植物〉，《故宮文物月刊》，期396，2016年3月，頁104-119。
- 馮明珠，〈永陵神樹：一棵攸關大清國運的榆樹〉，《故宮文物月刊》，期316期，2009年7月，頁84-95。
- 馮明珠，〈永陵河工〉，《故宮文物月刊》，期348，2012年3月，頁52-61。
-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29期2，2011年冬季號，頁1-75。
- 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絡在清宮〉，《數位文化電子報》，期21，2015。
- 賴毓芝，〈康熙朝宮廷「畫院」的運作與盛清院體的奠立：以蔣廷錫團隊為中心〉，《藝術學研究》，期31，2022年12月，頁1-106。
- 聶崇正，〈記故宮倦勤齋天頂畫、全景畫〉，《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頁19-22。
- 聶崇正，〈清宮廷畫家王幼學、王儒學兄弟〉，《紫禁城》，2011年第12期，頁86-90。
- Emily Byrne Curtis 著，劉祐竹翻譯，〈耶穌會士湯執中：乾隆皇帝宮廷裡的玻璃工匠與植物學家〉，《故宮文物月刊》，期353，2012年8月，頁38-45。
- Crossley, Pamela Ky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 *Late Imperial China*, 6:2 (December 1985), pp. 13-24.
- Crossley, Pamela Kyle. "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4 (November 1987), pp. 761-790.
- Elliott, Mark C.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August 2000), pp. 603-646.
- Rogaski, Ruth. "Knowing a Sentient Mountain: Space, Science, and the Sacred in Ascents of Mount Paektu/Changb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2:2 (March 2018), pp. 716-752.
- Sary, Giovanni. "Il 'Vero' Esploratore Del Changbaishan e Il Valore Delle Relative Fonti: Un'analisi Critic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78: 3/4 (2005), pp. 501-522.
- Wang, Lianming. "The Last Gift from Beijing: Jesuit Botanists and the European Quest for Chinese Plants." *Sulla Via del Catai*, 13:22 (May 2020), Special Issue "Flora e giardini: influssi e suggestioni nei secoli tra Cina e Occidente," edited by Maurizio Paolillo, pp. 126-155.

四、網路資源

-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卷7，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線上年版：<https://www.iplant.cn/>。
- 中國植物圖像庫：<http://ppbc.iplant.cn/>。
- 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資料庫：<https://www.cvh.ac.cn>。

日本東北大學「滿洲語辭典」：<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manchu/list?groupId=11>。

日本東北大學「言語資料索引」：<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kdic/listAction>。

林務局網站：https://media.forest.gov.tw/photo_page.php?mID=TFB-ph-103_00_08291。

Drawings of Chinese plants and fish by native artis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ohn Bradby Blake (1745-1773) (M-152), John Bradby Blake Archive,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 Contact: <https://www.osgf.org/john-bradby-blake>.

Image, Investig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Auspicious Tree of Mount Changbai and Qing Imperial Legitimacy

Lai Yu-chih*

Abstract

Mount Changbai was considered the birthplace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us being situated as not only a sacred mountain of the Qing Empire but also a symbol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its destiny.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his reign (1752), the Qianlong Emperor composed “Song of the Auspicious Tree” 瑞樹歌, which extols an extraordinary tree that grows deep within the mountain. Beyond its enormous size, the tree was said to bear up to eight different types of leaves and fruits, as well as having lingzhi mushrooms growing in a ring around its trunk. As such, Qianlong regarded it as symbolizing the everlasting prosperity and boundless territory of the state.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works created in the Qing court that depict the tree: a monumental hanging scroll titled “Auspicious Tree” 瑞樹圖軸 by Wang Youxue held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and two collections of paintings that share the same title of Collection of the Auspicious Tree 瑞樹圖冊, one by Yu Sheng and Wang Youxue with the other by Yu Sheng alone, which are both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By incorporating materials in both Manchu and Chinese from the imperial archives,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Qianlong Emperor’s fascination with this auspicious tree and why he dispatched a team to conduct an on-site investigate.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conscious choices made by the investigative team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eight species of trees from Manchu into Chinese, as well as the deliberate use of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 and pictorial traditions by court painters. This article ultimately demonstrates how the Qianlong Emperor employed a combination of a European illusionistic style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practices to construct a tangibl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Manchu ancestral roots and ruling legitimacy over the Qing.

Keywords: auspicious trees, Mount Changbai, Manchu-Chinese translation, New Manchu language, Qing court painting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